

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

通讯

第5期（总第401期）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2023年5月5日

-
- ◆ 食物保障安全是现代化强国的根本.....陈锡文(1)
 - ◆ 金沙河面临深层次问题.....郭书田(4)
 - ◆ 我和田家英的三次农村调查.....裴 润(6)
 - ◆ 农村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从何做起.....赵竹村(12)
 - ◆ 中国的两个人口转折点.....蔡 昉(14)
 - ◆ 奋力开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局面.....郭凤莲(17)
 - ◆ “后精准扶贫”时代的贫困：性质、成因及其治理路径.....左 停 李 卓(19)
 - ◆ 吴象千古.....丁 东(28)
 - ◆ 99岁院士开公号：早已想通生死，但害怕与社会脱节.....田瑞颖 徐可莹 朱献东(31)
 - ◆ 江苏华西村：以百姓为中心，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华西村供稿(35)

食物保障安全是现代化强国的根本

陈锡文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基础上有了新的提升。关于农业强国，主要谈三点认识。

一、怎么理解农业强国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系

凡是农业强国必然已经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反之，已经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国家未必是农业强国。当今世界，已经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国家有 20 多个，但农业强国寥寥无几。例如日本、以色列、荷兰等国家虽然依靠自身比较优势，实现了农业农村现代化，但不能被称为农业强国。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国家不能依靠自身力量解决本国国民的基本食物供给问题。一旦国际形势出现动荡，这些国家将面临很大风险。

2013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一个国家只有立足粮食基本自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进而才能掌控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局，靠别人解决吃饭问题是靠不住的。如果口粮依靠进口，我们就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到，世界上真正强大、没有软肋的国家，都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美国、俄罗斯、加拿大和欧盟的大国都是粮食强国，这些国家之所以强，是同粮食生产能力强联系在一起的。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之所以强调大国，尤其是人口大国，必须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是因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有可能在吃饭问题上被别人“卡脖子”，甚至在关键时刻被人“一剑封喉”。正因为如此，党和国家才始终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建设农业强国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本身是一致的。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建设农业强国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从农业强国的特点和目前世界的表现来看，只有真正能够依靠自己力量解决吃饭问题的国家才能称得上是农业强国。

二、当前中国的粮食安全形势

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亿万农民的不懈努力下，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 19 年丰收增产，2022 年更是创造了新的历史最高水平，总产量达到 68652.8 万吨（13730.6 亿斤），其中谷物产量 63324.3 万吨（12664.9 亿斤），稻谷和小麦产量分别为 20849.5 万吨和 13772.3 万吨。2022

年人均拥有的国产稻谷和小麦总量为 494.69 斤，基本做到了口粮绝对安全。但我国粮食进口数量依旧不少。据海关统计，2022 年粮食进口（包含大豆）高达 14687 万吨，相当于国内粮食总产量的 21.4%，其中大豆进口量 9108.1 万吨。因此，从总的食物需求来看，即便做到了口粮绝对安全，我国对国际市场还存在相当大程度的依赖。

食物安全中，粮的安全在食的安全中占据主导地位，没有粮的安全就没有食的安全，但是有了粮的安全也不一定完全能保证食的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我国口粮供给已经绝对安全，但从食物供给来看，我国粮食仍然处于总量不足、结构性矛盾突出的状态。在国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人们的食物消费中口粮比重持续下降，其他食物比重不断上升。因此，虽然我国的粮食总产量已经超过 6.8 亿吨，但是我国的粮食消费量实际超过 8.3 亿吨，每年从国际市场进口 1.5 亿吨粮食已然成为一种常态。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要再新增 1000 亿斤（5000 万吨）粮食产能的目标。即使实现了这个目标，距离满足人口食物消费需求还存在 1 亿吨粮食的缺口，需要长期通过国际市场来弥补。

结构性矛盾突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的区域之间供求矛盾日渐突出。例如南北地区之间人口分布、资源分布和粮食分布的矛盾关系，以及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三者之间的格局变化。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到现在，能够调出粮食的省市数量在不断减少。因此，如果不抓紧健全对粮食主产区的利益补偿机制，粮食主产区和产销平衡区的数量还会进一步减少。二是粮食供求中品种结构的不平衡问题。总体来看，我国稻谷、小麦在正常条件下供过于求，不仅库存比较充裕，而且还经常以库存的小麦和稻谷去弥补饲料缺口，体现出口粮绝对安全。而油料、糖料、饲料则明显供不应求，必须通过进口来弥补。在农业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如何通过优化品种结构，加快科技进步，逐步降低油料、糖料、饲料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建设农业强国必须认真应对的问题。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扩充油料种植，今年中央又明确部署增加大豆油料。因为大豆自给率最低的时候，85%的大豆依赖进口，风险较大。进口大豆最主要是两个用途，一是榨油，二是榨油之后的饼粕用作饲料。但国内生产的大豆品种大多是食用大豆，蛋白质含量高、出油率低。食用大豆供给充足但榨油大豆缺口较大，这导致国产大豆销路困难。因此，食物结构优化一定要细分到品种和用途。

食物供给安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基于我国的人地关系，人均耕地面积仅 1.35 亩，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 50%，同时我国水资源也不及世界人均水平的 25%，我国用占全球 9%的耕地、6%的水资源，要养活全球 18%的人口，在这样的资源条件下，我国的粮食安全、食物供给长期会处在一个紧平衡的状态。保障国内粮食安全，还需要树立大食物观，持续抓好食物的节约和减损。关注当前粮食安全，需要时刻关注一些具体问题。从国内来看，一是年度粮食产量的波动；二是国内各类粮食库存变化，包括政府的储备库存、调节库存，企业的商业库存，粮食贸易商的周转库存等；三是年度粮食进口数量和品种变化；四是饲料和工业用粮的变化；五是种粮农民的家庭存粮变化。从国际来看，一是气候变化尤其是

极端性气候变化对全球粮油产品供给的影响；二是地缘政治冲突引起的粮食生产贸易的遏制；三是粮食和油料糖料越来越多的被作为生物质能源的原料；四是长臂管辖、单边制裁等和粮油国际市场的垄断和炒作。还有一点，国内国际都需要关注，谨防新冠疫情反复、延宕对食物供给、需求和供应链流通的影响。因此，当前我国的粮食安全和食物安全问题处在一个非常复杂的背景下，我们必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及时获取精准信息，制定有效对策，落实多种措施。

三、耕地保护问题

自然资源部公布，2022年年底，全国耕地总面积持有量为19.14亿亩。国土三调公布的2019年数据是19.18亿亩，两相对比减少了400万亩。这说明我国目前的耕地形势十分严峻。从国土二调到三调的十年间，我国耕地总面积减少了11300万亩，平均每年减少1130万亩。除东北三省以及内蒙古、新疆自治区外，其他26个省区的耕地面积都在减少。严格保护耕地早已被确定为国策，但违规占用耕地仍然屡禁不止，耕地占补平衡在实际中存在占优补劣的现象。这造成耕地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所下降。因此，必须坚决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对令不行、有禁不止、失职渎职的，要严肃追究责任”的要求，确保耕地数量不减、质量提高。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概述了建设中国特色农业强国的五个主要方面：一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端牢饭碗；二是依托双层经营体制发展农业；三是发展生态低碳农业；四是赓续农耕文明；五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真正的农业强国，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其中，依靠自身力量端牢饭碗是最根本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农业保的是生命安全、生存安全，是极端重要的国家安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冠疫情反复延宕，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不断升级，各种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只有农业强起来，粮食安全有完全保障，我们稳大局、应变局、开新局才有充足底气和战略主动。我们必须认真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落实好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绷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这根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努力完成中央提出的到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和国家同步建成农业强国，从而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下坚实基础。

（作者：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来源：清华研究院，2023年3月29日）

金沙河面临深层次问题

郭书田

金沙河的进一步发展会遇到难以回避的困难，特别是体制和政策的障碍，这就需要发扬勇于改革的精神，率先突破这些障碍。

第一，把土地所有权还给农民。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又是农民最大的资产，可是农民土地所有权一直处于虚化与缺失状态，在工业化、城市化大发展中，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积极推行股份合作，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但由于缺乏法律依据（人大因认识不一致拒绝立法），基本未能落实，每年的土地出让金数万亿元，由地方政府垄断一级市场，以低价征收征用农民的土地，变为国有，又经营二级市场，以高价卖给房地产开发商，从中获得巨额的土地出让收入，成为财政收入重要来源，已坚持数十年之久，迄今尚未解决。他们常常以反对私有化的意识形态为名，实行保护既得利益之实。前年在第二次修改《土地管理法》时，由于反映强烈，在最后加了一句，在政府提出用地计划包括面积与价格，30天以内当地多数农民反对，不予执行。中农办根据“取之于农，用之于农”的原则，提出土地出让收入返还农村的由只占6%，提高到不低于50%的要求，也未见成效。农民集体所有的三种土地（承包地、宅基地、建设用地的管理异常复杂，成为干部“寻租”的条件。这一情况在新时代是难以为继的，必须痛下决心加以改变。出路在于尽快立法，但需要一个过程，在尚未立法之前，允许地方突破这一体制，通过股权还权于农民。金沙河在这方面有了一定的基础，把地租农户与股权农户统一起来，把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与所有权统一起来，使农民真正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力（包括资产处置权与收益分配权），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必须解决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体制问题。在土地资源配臵中，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而不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要把土地延伸的既得效益，分给提供土地的农民。

第二，实行城乡统一的居民户籍制度。城乡两种户籍制度是在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难题。这一制度在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制度之后建立起来的，在改革开放中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已寿终正寝，而户籍制度，仍顽固的未予改变。中央允许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放开户口，实行统一的居民户口，促进城乡之间各种要素的流动，受到欢迎。户口是身份的称号，而由户口带来一系列有关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以及政治权益的差别引起农民的不满，包括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2.5亿）仍不能享受当地城镇居民的同等权利，形成由“世袭农民”转为“两栖农民”，使城乡二元结构更加复杂化，成为不可改变的难题。金沙河所在的南和县与邢台市可在这个问题上迈出第一步，取得经验在全市推广。

第三，恢复基层的供销社与信用社。两社产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是农民与土地一起入股建立起来的，但在高级农业社与人民公社时期，两社背离了“亲娘”农民成为“二国营”。改革开放后基层两

社基本消亡，而县级以上的实体，成为纯商业性组织，而且不断发展壮大。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与农民银行，高楼缺乏地基，有垮台的危险，恢复两社应坚持以农民为主体，以服务农民为宗旨，与农业社形成“三足鼎立”的合作体系，也有利于推进国际合作，如“一带一路”的农业合作。金沙河为农民生产与生活服务的组织是很强的，包括县乡政府主管的，应通过改革，使其成为以农民为主体的合作组织。

第四，矫正基层组织的关系。农村的基层组织有三个，一是党支部，二是村民委员会，三是合作经济组织。近些年来，三个组织之间关系意见不一致，矛盾甚多，引起农民不满。党支部发挥战斗堡垒核心作用，干部们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村民委员会及其下属村民小组是社会组织，从事社会事业的管理，包括医疗、居住、教育、文化、治安等。经济组织的职能拓宽了范围，一是大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业齐进，二是农林经济在乡镇企业的基础上包括工商建运服成为中国民营企业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棵“参天大树”。三个组织支撑着农村的全民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组织基础，只能强化，不能削弱。而且使其有理、有序、协调发展。在建立“两委”（支部、委会）联席会，增加一个经济组织委会，形成三委联席会，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统一起来，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统一起来。总之，三个基层组织的主体是农民，维护农民利益，为农民服务是神圣责任，农民权益包括：知情话语权、决策参与权、资产处理权、收益分配权、监督管理权。目前，村级债务十分庞大，据农业农村部抽样调查统计，全国 707 个行政村债务达 9000 亿元，每村平均 130 万元。金沙河面业集团按种植面积每亩补助 50 元用于公共服务开支，是个好举措。

第五，落实好科技兴农战略。金沙河在这方面有较好的基础，发展智慧农业，数字农业，网络农业等，立足本地，面向全国，走向世界。扩大职业农民组织，提高他们的现代科技水平，农业进入电脑化，创造世界一流的现代农业劳动生产率，在创造，消灭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中取得的进展，作出新贡献。为此还要优化产业结构，农村的第三产业发展不足低于第二产业，农村发展第三产业有两大优势：一是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二是从寒温带到赤道热带丰富的自然资源，两者结合起来就能形成独特的旅游业，使之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课堂，潜力甚大，值得大力发展。

行政管理机构属上层建筑，在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五级管理层（中央——省——地市——县——乡），公务员队伍庞大，有人提出参照国际经验，精简为三层（中央——省——县），把地市变为省的派出机构，把乡镇变为县的派出机构，实行乡民自治，除保留执法队伍外，将服务产业组织变为企业，走向市场，进入第三产业，这也是值得展开研究的重大课题。

（作者：原农业部政策法规司长、高级经济师。2023 年 3 月 13 日）

我和田家英的三次农村调查

裴 润

60年代，我曾三次跟随毛主席的秘书、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同志到农村调查了解人民公社问题。这三次调查，都是在毛主席地亲自安排和指导下进行的。一次是1961年1月下旬至5月上旬的浙江调查，一次是1961年10月下旬至12月底的山西调查，一次是1962年3月至6月的湖南调查。

一、浙江调查和“六十条”试点工作

这次调查，是在极左思潮泛滥、大刮“五风”的恶果已经暴露，国民经济不断恶化，甚至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极度困难，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弊端也逐渐为人们所认识的背景下进行的。此前，中央于1960年11月3日虽发出了《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即12条），但不少地方，“五风”（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仍未停止，特别是浮夸风造成的高指标、高征购，给群众生活造成极大的灾难。

面临以上严重困难，毛主席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1月20日，毛主席写信给田家英，要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各带一个工作组去浙江，湖南、广东作调查。田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并指示每组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一个最好的生产队。时间10至15天，然后三个组同去广东会合，向他报告当时，我和王录同志在中央农村工作部二处（主管人民公社政策研究）工作，被指定参加这次调查工作，我去浙江，王去广东。田家英同志领导的浙江调查组于1月22日到达杭州。经与省商量，决定分两个小组，一个去嘉善县选一个最差的生产队，一个去富阳县选一个最好的生产队。田家英同志重点抓嘉善县那个最差的生产队——和合生产队，我被分配到这个生产队。

毛主席写给田的信中附了《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我们在赴浙途中即学了这篇文章。按照毛主席的批示田家英同志对工作组提出：“打开脑筋，敢于发现问题。”他拟了一副对联，作为调查组的守则。上联是“同吃同住不同劳”。下联是“敢想敢说不敢做”。在工作组内部反复动员大家打破思想框框，不设禁区，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只是不准对县、社领导指手画脚，随意指挥。

当时，农民的住房很紧，有些户的多余房子，也被所谓“六集中”（猪羊、耕牛、家具、人口、公共食堂和自留地）的时候，无偿调用或拆迁了。所以和社员同住做不到。田家英同志和大家一起住在一个四面透风的草棚里，用稻草打地铺。白天分头出动调查访问，晚上回来汇报、议论。没有灯，一团漆黑，几乎谁也看不见谁，但大家真正敞开思想，有啥说啥议论很热烈。田家英同志把这叫作“瞎吹”。我多年来没有感到心情这样舒畅。

这个生产队原来是一个高级社，共有327户，1236人，3753亩耕地，人均3亩，位于杭嘉湖平原的水网地区，素称“鱼米之乡”。但是，在大刮“五风”中，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粮食亩产量1960年急剧下降到291斤，还不及解放前的常年水平（350-380）。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尤其是上面虚报浮

夸粮食高产量，带来高征购，挖了群众的口粮，“上面吹牛皮，群众饿肚皮”。1959年以来，连年闹春荒。1960年完成征购任务以后，每人每天有半斤米，每天三餐稀粥，蔬菜很少。由于营养不良，1959年开始即出现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据调查，1961年春，共有170个病人，占全队人数的13%，占劳动力总数的19%。

我分工查1960年的收益分配帐，同时由省委一位同志陪同调查了六个典型户。查了1960年的分配帐以后，我概括了四句话：生产下降，收入减少，集体负债，社员倒挂（即超支）。家英同志对这四句话很欣赏。这个队1960年总收入比上年减少39.65%，共欠国家贷款4800元，人均31元多。社员苦干一年，每个劳动日值只有0.163元。人均收入只有21.27元。因而多数户应分的现金不够口粮钱，只得倒挂，倒挂户占总户数的58.8%。

经过几天的调查，把这个队的现状基本摸清了。田家英同志说：这种情况说明，出现了农业危机，其原因，既不是天灾，也不是什么民主革命不彻底，而是“人祸”即“五风”造成的。

田家英同志很重视历史的调查，通过座谈和典型户调查，对这个队从解放前、土改后到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公社化的历史得到系统地了解。回顾过去，社员普遍怀念初级社。从高级社以来，产量基本上是逐年下降，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工分一年比一年挣得多，钞票和口粮一年比一年少”。贫农社员王老五说：“小社（初级社）那年（1956年），生产生活最好，粮食亩产400斤，口粮足，钞票多，吃得饱，力气足，心里高兴。”当时他曾想，小社分这么多钱，大社（高级社）更有得分了。哪知道从此以后，年年没钱分，年年倒欠。一部分上中农对于高级化时，耕牛、家具入社折价款（扣除股份基金以外的部分）未退赔，意见很大。

在汇报和“瞎吹”中，有的同志主张办好公共食堂。对于食堂问题，我曾作过调查，我主张办农忙食堂。但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的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评，仍然心有余悸故虽有不同看法，但未表态。其他同志也未提出异议，这个调查组也未就食堂问题开展调查和讨论。而富阳调查组调查了公共食堂问题，得到田家英同志的支持，并向毛主席作了汇报。这说明我的思想还未解放。家英同志在一次同我谈话中，曾批评我思想不解放。我第一次听到对我这样的批评，而在此以前对我的批评都是右倾。我虽心服，但仍存芥蒂。1957年以来，每次反右运动，我都是批判的对象。至此以后，我只是警惕着，说话也很谨慎。

田家英把这个生产队的历史和现状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当时毛主席住在杭州），同时也汇报了富阳调查的情况，并提出了中央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建议。毛主席听了汇报以后，做了重要指示。家英向我们作了传达。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规模问题，和合生产队太大了，是否分成三个队；起草一个公社工作条例，规定公社三级怎样工作；食堂问题，可以多种多样；退赔问题，自留地问题；干部手脚不干净问题，等等。

2月21日，田家英离开杭州去广州，三个调查组在广州会合。在毛主席亲自指导下，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3月26日田家英同志回到杭州，带回《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并且传达了毛主席在广州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我记得最深刻的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田布置调查组继续在浙江搞“六十条”的试点工作，强调继续开脑筋，敢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由省委林乎加同志陪同，田家英同志带领我们到了越剧的故乡嵊县。我们到了一个生产大队，向干部群众逐条宣读“六十条”，引导群众讨论。“六十条”草案还未明确解决食堂问题。群众提得最强烈的是食堂，这个队群众生活也很困难，公共食堂仍是每日三餐粥，没有什么菜，靠挖竹笋做菜。一天早

晨起来，我们发现个个嘴唇都是黑的，互相对着发笑，不知何故。当地同志告诉我们，是吃了竹笋的原故。

浙江调查和试点工作，直至4月底结束。我们于5月上旬回到北京。

“六十条”（草案）是在毛主席直接指导下制定的，但是首先建议起草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是田家英同志。在整个调查和试点工作中表现了田家英同志热爱人民，关心群众疾苦的感情；实事求是，深入下层的作风；坚持真理，敢于直言的勇气。

二、山西调查和起草《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草案）》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根据中央各部和各省、市的调查，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作了修改，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修改部分主要是取消了原草案中关于食堂和供给制的规定。同时，中央发出了《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在各地继续讨论和试点中，进一步揭开了所有权和分配权的矛盾。即“六十条”解决了生产资料生产队所有问题，但仍实行以大队为统一核算单位，仍未解决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同年9月27日，毛主席召开了邯郸谈话会，就基本核算单位问题亲自作了调查。29日，他写信给中央政治局，明确表明自己的意见，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应是生产队而不是大队。他说：“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即生产队），分配权却在大队。”之后他又批示田家英就这个问题进行调查，并为中央起草一个指示。

根据毛主席的批示，田家英同志第二次组织调查组，于10月下旬去山西调查，我和王录又参加了这次调查工作。经过同山西省委和长治地委商量，决定去潞城县魏家庄大队作调查。这个2000多户的大队。属老解放区，互助合作起步较早，基础较好。但是，实行大队核算而由大队统一分配，队与队之间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依然存在。生产队没有自主权，影响生产队的积极性。后来，又选择了晋城县一个独立核算的生产队进行调查。这是一个小山村，20多户，原是一个初级社。高级社、公社化以来，一直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由于生产和分配统一起来，社员直接看到集体生产的好坏同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因而能够自觉地关心集体，参加管理，监督干部。干部的手脚比较干净，社员之间也便于互相监督，因而这个队生产比较稳定，社员生活也比较好。总之，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有什么好处在这里得到了答案。

大约在11月底，调查组回到太原。首先向省委作了汇报，记得有的领导同志仍然强调大队核算的好处，想多保留大队核算。田家英同志根据我们的调查，讲了自己的看法，说明毛主席的批示是完全正确的，有的主张独村（一个自然村）大队、办得比较好的，仍可维持大队核算。田认为这只能是少数。

接着，调查组在太原晋祠招待所起草《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指示（草案）》。经过讨论，定下了文件的结构后，由几个人分工去写出草稿，每个人一部分，然后由田家英同志统一综合。实际上，文件草案都是由田家英同志亲自动手写成的。为了进一步印证文件的内容，最后，我们顺便到雁北地区，考察了大同县的一些社队，于12月底回到北京。

文件草案先经毛主席审阅后，提交1962年1月至2月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讨论。我参加了这个文件的讨论和修改工作。大家一致称赞这是一个好文件。重要的修改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批示增加了“至少三十年不变”的内容，这对于稳定人心，调动农民积极性，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解决了农民“怕变”的思想。1962年2月13日，正式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

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后，人民公社所谓“政社合一”，从“社”（经济）的方面看绝大多数已名存实亡，有的叫“清水衙门”，大队一级实际上也变成虚的了。

三、从湖南调查到安徽调查“包产到户”

七千人大会后，1962年2月25日，毛主席指示田家英再组织一个调查组，到湖南作调查，主要了解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并指定到湖南湘潭县的韶山、湘乡县的塘家和宁乡县的炭子冲。接着田家英同志又组织了一个调查组，我和王录同志又被指定参加这个调查组，同时又增加了农村工作部的两个同志。3月上旬，田家英带领工作组先去湖北武昌东湖（毛主席当时在武昌）。3月22日毛主席在武昌东湖招待所接见了调查组全体成员。记得主席一个个地问了每个人的名字，并且问当过县委书记没有？当过地委书记没有？他谈笑风生，讲了一些当时流行的政治笑话，使大家感到轻松而又亲切，接着做了几点指示：要同当地干部，省、地、县、社各级干部相结合，不要乱指挥；头脑里不要带东西（即思想框框）下去，只带一件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要做历史的调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观点；看到坏人坏事别乱说，好的可以说；参加点轻微的劳动。最后，全体调查组成员合影留念。

3月底，调查组全部到达湖南，分三路到达韶山大队、大平大队、（即唐家）。田家英同志住在韶山，我被分配到韶山大队，住在关公桥生产队。

韶山大队虽然是毛主席的故乡，省地县领导对这里的工作比较谨慎，但大刮“五风”时期，这里也未能幸免，只是比湘潭县或韶山公社的其他大队轻一些罢了。“五风”来得快，去得也比较快，为害时间不长。

在刮“五风”时，实行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办公共食堂“六大集中”。全大队25个屋场的居民都集中到六七个屋场。社员迁徙无时，有的搬家十次以上，耕畜、农具、家禽、损失也很严重。瞎指挥，盲目扩大双季稻面积，过分密植，造成人为减产。但是，这里贯彻“六十条”和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指示比较认真。尤其是解散食堂、划分自留地、打破“居住集中”的限制后，从1961年起，生产开始恢复，社员生活也得到改善。

根据历史调查，这个大队从高级社以来就开始减产，农民生活也开始下降，高级社后，从1960年水稻亩产比1955年下降14%，1960年粮食亩产只有471斤，比1955年下降17%，总产下降27%，农民平均口粮只有354斤（稻谷），比1955年减少45%。据关公桥生产队调查，这个大队的范围（22户），从初级社就开始减产。

为什么初级社时还减产，甚至不如解放前、土改后呢？农民答复是：许多人加入初级社是“口愿心不愿”，犹豫不定。当时，上级一面宣传“入社坚持自愿”，一面说“入社光荣，单干可耻。”并且在国家贷款、供应农具和商品肥等方面，对单干户排挤，所以不少人是“赤脚板打泥浆”，随大流进来的。其次，集体生产单位规模过大。1954年冬，韶山初级社由18户一下扩大到75户，建社准备工作很差，所以从那时起，大家就有了“坐大船”思想，平均主义已经产生，初级社下面的作业组之间，互相怀疑。不少人干活都不如单干的时候经心了。单干的时候，一天要到田头打几个转转，集体经营后，有的人看到田里漏水也不管，因为集体没有安排，得不到工分。第三，是耕牛、猪减少，农家肥减少。这个队的范围，1952年有耕牛14头，1955年入社时只剩3头。猪的数量，从1953年以后，就逐年减少，1948年有猪31头，1955年减少到25头，1960年只剩4头，都归食堂喂养。

解放以来，农民生活有升有降，穿的用的改善，文化翻身，“吃的一年不如一年”。高级社以来，口粮水平逐年下降，平均每人每年只有400斤，1960年最低降到340斤。田家英同志在武昌出发前就

对全体调查组成员讲，这次调查一定比前两次有新的水平，按正常年景，需要三四年。关公桥生产队座谈中，群众不谈合作化的优越性，至于公社化，一谈起来，就象诉苦一样。提到怎样才能巩固集体经济和恢复生产问题时，有人提出包产到户。那时包产到户是一个“禁区”，所以，我们只是向群众进行说服和解释。但是这是一个绕不过的问题。其他生产队也提出包产到户问题，有的呼声很高。

在调查工作的前期，田家英同志对于包产到户问题，闭口不谈，而且在一次包括大平大队和炭子冲大队的全调查组汇报会上，有一个同志大谈包产到户的好处，少数同志也或明或暗地附和，田还严肃地批评了这位同志。但是，据我观察，他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有一次，他问我：怎样才能更好更快地恢复生产？我说，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搞好生产队的经营管理。他未说话，但从表情上可以看出，他对我的答案是不满意的。坦率地说我当时不同意包产到户，也不敢想。我认为在集体经济不巩固的情况下，包产到户很可能滑下去，走向单干。这件事有一次表明，田家英同志既守纪律，又面对现实，敢于实事求是，冲破“禁区”，深入思考问题，而我的思想还没有解放。

又过了一段时间，记得是田家英从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回来以后，态度开始明朗起来。他说：少奇同志提出“要向农民让步”，包产到户，对于尽快恢复生产，克服困难，可能是一种有效的办法。于是他提出到安徽实行责任田较早的无为县进行调查，很快就做出决定，派我和在大平大队调查的两位同志同去。

我们一行三人，于六月中旬，从韶山出发，途经芜湖，到达无为县。在县委派人陪同下，考察了三个公社的几个队。这里看到的情况十分惊人！大刮“五风”时，危害最大的是“浮夸风”，由于虚报高产，带来高征购，有的社队打下的稻谷全部交了征购粮，秋后即靠敲稻秆秆的瘪谷充口粮。所以，由于饥饿引起的浮肿病、非正常死亡的严重性，在其他地方未见过。耳闻目睹那种惨状，令人很痛心！所谓“责任田”，实际上是在集体经济陷于瘫痪、集体生产无人负责的情况下，让群众自谋生路的一种办法。所谓“五统一”（生产计划即生产指标和主要作物安排统一，包产部分统一分配，队农活和技术活统一，用水和管水统一，抗灾统一）根本没有统起来。找不到会计和记分员，也看不到计分册，群众说是“分啦”（分田到户）！我们认为，实际上是单干了。

但是，在那种困难情况下，群众还是在积极苦干。即使是孤儿寡妇，也请亲戚邻居帮忙，把田种下去了。基本上没有看到撂荒田。因此，我们的意见，即使是单干，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对于渡过困难，恢复生产是有利的，所以不宜急于纠正。

大约在6月底或7月初，我们回到北京。我回到家后，即给家英同志打电话（他们先我们回京），他让我立刻就去汇报。我如实地说了以上所见所闻和我们的看法。田家英同志听到有的生产队非正常死亡的严重情况后，很动情地说：人都死了，还谈什么集体生产！

四、参与起草《恢复农村经济的十大政策》

我汇报以后，过了几天（大约是七月上旬），田家英同志在中南海居仁堂楼上一个议室召开了一个小型的会议，酝酿向中央汇报并准备起草《恢复农村经济的十大政策》的文件。参加的人除部分调查组成员外，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和秀才（我记得有马洪、梅行、许立群等）。我同王录也参加了。田家英同志首先根据调查情况，讲了一些意见，大意是，在那些破坏严重、生活困难的地区，应当允许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与其让群众自发地搞，不如我们有领导地搞。他估计，全国已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社队约占30%。有领导实行的结果，可能达到40%。另外60%是集体的或半集体的。现在搞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是一种权宜之计，等到生产恢复了，再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

他还说，合作化、公社化的经验教训，应当总结，走过了头就应当退回来，今天的退正是为了明天的进。这件事，不仅关系到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有一定影响。会上除个别同志对分田到户的提法提出异议外，没有异议。

这次酝酿会后，听说他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又一次表现了他不顾个人得失，为党为人民，敢于直谏的勇气。

我非常同意他讲的“走过了头就应当退回来”的话，这完全是调查中的体会。调查中反映，农民普遍怀念初级社，对公社化，“大跃进”普遍不满。时隔20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农业合作化以来对于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改造的要求过急，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时间内遗留了一些问题。接着，取消公社，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从而使农业生产快速恢复和发展。历史是最公正的，20多年后，田家英同志以上的话竟兑现，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如果田家英同志在世的话，他该多高兴啊！

8月上旬，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中央了作会议，我和王录同志作为王观澜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的助手，也到了北戴河。在会议前期，会内会外，包产到户成为热门话题。后来传达了毛主席关于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的讲话。会议批评了邓子恢和田家英同志。一天晚上，田家英同志到我和王录的住处，向我们谈了批判包产到户的情况。他很担心这次会后，又要掀起一次反右运动，特地向我们打招呼，并且让我们转告其他同志，让我们思想有所准备。这种关心人、爱护同志的感情使我们很受感动。

五、深切的怀念

我认识家英同志，是在1955年。那时，中央政治研究室就在万寿路（现为中组部招待所），与中央农村工作部对面。那年上半年，田家英同志主持起草《农业合作社章程》，我参加了一部分工作。自那以后，因为住地极近，经常见面，但不很熟悉。真正熟悉到相知，就是参加调查和几次参加修改文件的工作以后，家英同志平易近人，善言也很风趣，在调查和起草文件过程中，工作之余，他爱和我们聊聊，从中国历史到古典文学、诗词歌赋，以及当前问题，无所不谈。特别谈到他1959年四川调查和庐山会议上，因讲了真话，而受到不公正的批评甚至恶毒攻击，我则和他产生共鸣。对于他那种坚持真理、不畏权势的骨气，我很佩服。

在北京工作期间，我们也不断地有所交往。他很关心农村工作（我以为是毛主席让他分抓农村工作）、农村形势，特别对劳动农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曾多次向我了解农村情况，问我对农村形势的看法，我对他无话不谈，他很认真地听我的意见，并谈自己的看法。每次交谈，我都感到有所受益。因此，我视他为良师益友。1965年冬，谭震林同志派我带个调查组，到长江三角洲，调查那里的农业生产。我先到上海，在华东局农办同志陪同下，先后考察了上海郊区和市属的几个县，江苏省的苏州和无锡地区，浙江省的嘉兴地区。在嘉善特地看了1961年调查的和合生产队，看到那里的面貌已大大改观，非常高兴，最后，于12月中旬到达杭州，得知田家英同志正在西泠饭店，研究为几部马克思主义著作写序的问题。我专去看了他，谈了和合生产队的变化，他很高兴。中午共进午餐。饭后我即告辞，他把我送到门外，握手告别。万万没有想到，这次竟成永诀。

2002年6月2日

（作者：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正局级研究员。来源：当代农政，2023年3月6日）

农村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从何做起

赵竹村

基层党组织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心骨”。一些村党支部书记深有体会地说：“老百姓最希望看到跟着组织走有奔头，我们就是要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作为首要任务，牢记使命，不忘初心，为了群众幸福生活不懈努力。”党建引领乡村振兴，要求把党建工作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起来，在引领乡村发展的实践中加强和改进农村基层党建，通过加强基层党建来引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同时，要坚持大党建、大引领、大格局，不但乡村基层党组织负有党建引领的职责，城乡其它党组织也有着积极参与和支持乡村振兴的政治使命。只有加深对新时代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认识，才能不断打开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思路，在实践中不断拓宽具体的引领路径。

一是充分挖掘利用红色资源，以传承乡村红色文化和红色基因来引领乡村全面振兴。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中，我国各地不少乡村基层党组织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乡村红色文化、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北京市门头沟区清水镇黄安坨村党支部积极主动传承红色文化，在村里建设有毛主席纪念广场、纪念碑、纪念馆等，讲好革命故事、创业故事，为引领全村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精神动力。卢沟桥乡大瓦窑村 1924 年建立了北京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历史上的红色故事非常丰富，很早就建设有“党史馆”，成为重要的党史教育基地。怀柔区九渡河镇庙上村党支部，有“怀柔第一党支部”之称，在乡村发展中建设了党史馆，围绕“红色记忆”和“建设辉煌”等主题进行内容丰富的展示。怀柔宝山镇道德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高国民就认准了“红色传承引领致富路”这个路子，带领党员群众把红色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力，焕发了美丽乡村活力。

二是聚焦聚力搭建富村富民产业平台，以“基层党建+发展示范项目”来引领乡村全面振兴。在乡村全面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中，广大基层干部群众最为关心的是，当地究竟适合发展什么样的产业和项目，怎样才能选对路子、找准项目，带领老百姓实现转型发展和共同致富。一些乡村党支部一手抓党建，一手抓项目，以党建引领发展示范和项目带动，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与支持。北京市怀柔区琉璃庙镇梁根村党支部就认准了引领和支持发展“梁根木耳”这个致富产业项目，积极联系市农业推广站的木耳种植专家等，经过摸索总结出种木耳 11 步工作法，引领木耳项目真正发展起来，终于打开了脱贫增收的突破口。实践表明，乡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紧紧围绕中心，聚力抓发展示范、项目带动，是乡

村党建引领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也是推动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抓手。

三是抓住办实事惠民生，以提升党组织统筹资源和服务群众的能力来引领乡村全面振兴。长期以来，北京市实施“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其中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把力量和资源沉到基层，使基层党组织增强服务老百姓的能力。北京市密云区东邵渠镇西邵渠村党支部为了解决村民办事难的问题，很早就努力建成便民服务站，共设6个窗口，有117项便民服务项目，以及卫生服务站、文化活动站、托老所等，通过为村民办实事、做好事，得到了老百姓的一致拥护。怀柔区桥梓镇北宅村党支部坚持留住绿水青山，建设美丽乡村，拆除私搭乱建54处，修建了历史文化街，建设了文化活动中心，建成了污水处理厂，成立就业委员会，为有就业愿望的村民全部解决就业。这些实打实的民生服务，使老百姓增加了获得感、幸福感，增强了归属感。

四是加强城乡基层组织结对共建，以乡村党组织与企事业单位党组织联建来共同引领乡村全面振兴。多年来，北京各个乡村党组织与大量在京企事业单位包括高校及科研院所有着密切联系，通过基层党组织之间牵线搭桥，形成了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共建协作模式。21世纪以来，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坚持改革创新，在北京高校率先创造性开展“红色1+1”活动，并被市委教工委推广到了整个北京高校，打造了“红色1+1”、“百名博士老区行”、“农科学子助力精准扶贫联合实践行动”等品牌，农大学生党支部深入全国各地特别是京郊农村开展“红色1+1”科技帮扶、“百名博士老区行”活动，在全国建设了数百个“科技小院”，零距离、零时差、零费用服务三农，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学问做到老百姓心坎中。这些基层党组织共建协作的宝贵经验，充分反映了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独特优势。

（作者：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兼研究室主任。2023年3月11日）

中国的两个人口转折点

蔡 昉

通过考察两个人口转折点，即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人口总量两个峰值及随后的负增长，我们可以更确切地揭示人口红利消失的具体表现，从而更深刻地认识人口负增长时代的经济增长挑战。

观察人口转变过程及其重要转折点在多大的显著性意义上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或负面影响，无疑是认识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恰当角度。从相对长期的视角来看，得益于人口红利及人口红利开始消失后的恰当应对，中国经济已经实现对中等收入阶段的跨越。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把受人口因素影响的长期趋势与受各种不测因素影响的短期冲击结合起来，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和波动性，在熨平周期的同时，使宏观经济在正确的轨道运行，从供求两侧增强经济增长可持续性。迄今为止，我们从经验上能够观察到的人口转变最高阶段，就是一个国家在相继经过两个人口转折点之后，进入不可逆转的人口负增长时代。无论是中国，还是一些高收入国家看似水到渠成的老龄化，都展现出类似的现象，揭示了同样的逻辑：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既表现在社会总供给能力的进一步弱化趋势上，也表现在社会总需求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常态制约中。

既然这种新常态及其带来的新挑战是人口转变阶段和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必然结果，我们无法否认和回避，正确的选择便是利用机会窗口和调整空间，认识、适应和引领这个新常态，应对这些新挑战。

一、人口转折点

人口转变发生从低到高的阶段性变化，其原始驱动力是生育率的持续下降。虽然一个时点上的生育水平未必对人口的动态和结构特征产生直接影响，但是生育率的长期下降终究会积累足够大的势能，使人口的动态和结构特征发生根本的变化。对经济增长而言，最具影响力的人口变量是人口总量、增长率和年龄结构。因此，人口总量或者其中一部分在数量上达到峰值的时刻就具有转折点的意义。与此相应，峰值之后的负增长更具有改变经济增长常态的效应。为了清晰地观察中国的人口转折点，我们按照时间顺序分别展示了两个人口峰值和两次随之而来的人口负增长，即劳动年龄人口峰值和负增长及人口总量峰值和负增长。归根结底，认识人口转变阶段的目的在于理解由此导致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但是，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时代，并不意味着人口红利完全消失，或者说，还不是人口变化因素冲击经济增长最严重的情形。根据联合国最新的人口预测，中国在人口总量于2022年达到峰值后，就进入真正意义上的人口负增长时代。应该说，这才是最具标志性的人口转折点。人们在谈到人口对经济增长的挑战时，通常用人口老龄化这个概念一言以蔽之。其实，这样说过于大而化之，常常让人看不到老龄化语义背后的真正含义。也就是说，老年人口数量在人口总量中占比的提高，尚不足以揭示人口转变阶段变化对经济增长负面影响的全貌，更表达不出这种不利影响的严重程度。

通过考察两个人口转折点，即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人口总量两个峰值及随后的负增长，我们可以更确切地揭示人口红利消失的具体表现，从而更深刻地认识人口负增长时代的经济增长挑战。

二、充分认识“人口红利”

人们常常用“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形象地刻画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把“生之者”视为劳动年龄人口，把“食之者”视为非劳动年龄人口，这样的人口结构就表现为：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占比高；另一方面，非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慢、占比低。一般来说，这就是能够带来人口红利的那种合意的人口结构特征。反之，一旦人口年龄结构逆转到“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格局，即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从而占比下降，而非劳动年龄人口（特别是老年人口）增长快从而占比提高，就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我们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进一步认识这种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口红利理论在经济学界特别是增长理论中破土而出，人口红利这个概念也渐渐成为许多国家政府和智库的热门话题。然而，如果说存在这样一个理论流派的话，总体来说，它始终没有在经济甚至增长理论中获得过主流的地位。究其原因，是这一流派过于局限于用单一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作出解释。例如，在该领域，多数研究只把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的代理变量，观察其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向、显著性和幅度。如此这般进行的人口红利研究，不啻对分析的范围做了自我限制，未能看到抚养比这个人口变量之外的变量，甚至很多增长核算和增长回归中采用的多数其他变量，从根本上说都是与人口因素相关的。站在纯粹的学术角度看问题，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不能与主流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保持逻辑上的内在衔接，并在此基础上充分理解进而阐释清楚人口红利，这种理论范式便失去对前者作出颠覆性修正的良好机会，致使人口红利理论在增长理论中始终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不过，归根结底我们关心的是如何认识现实中的人口红利现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妨设想一个生产函数，其中等式右边的各种变量均被用来解释等式左边的GDP增长率。根据经济学家具有共识的生产函数自变量，我们可以观察其中的每一种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对GDP增长率的贡献及其变化。实际上，借用生产函数这个概念，意图就在于揭示人口红利的具体统计含义，从供给侧认识经济增长现象。下面，我们看“生之者众”条件下的情形。

第一，人力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种贡献可以从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是用人数来衡量的劳动力。劳动年龄人口并不全是劳动力，因为在符合法定就业年龄的人口群体中，总有一部分由于在学、生病、失能，或者需要照料子女或老人等原因，并没有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意愿。显然，只有那些有就业意愿的劳动年龄人口才是劳动力。不过，劳动参与率（即希望就业的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一般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和增长决定了劳动力的规模和增长。二是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的人力资本。在中国的情形下，新成长劳动力具有更高的受教育程度，因此，当这个人口群体增长快的时候，劳动力整体的人力资本改善速度就明显。

第二，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种贡献也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观察。一是经济活动中的物质资本投入，包括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流动资金和形成新的生产能力的固定资产投资。二是为使用土地或其他资源而投入的资金。这种物质资本的投入与人口年龄结构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就意味着具有较低且持续下降的人口抚养比，即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间的比率，因此

社会有条件形成较高的储蓄率。另一方面，劳动力供给丰富，就可以使物质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维持合理的投入比例，阻止资本报酬递减规律发挥作用，避免出现资本投入内卷的现象，就能保持较高的投资回报率。

第三，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根据产生的性质和度量的方法，通常有两个重要的生产率指标。劳动生产率衡量的是单位劳动投入创造的产出，通常由人力资本水平、资本投入强度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决定。全要素生产率是资本、劳动、资源等要素投入的产出贡献之外的产出增长，主要反映的是要素的配置效率。在有利的人口机会窗口期，除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新机器设备的使用，农业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地转移到非农产业，实现更充分的就业，就意味着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部门，实现重新配置。对中国来说，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在相当长时间里是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源泉。有利的人口结构在上述方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表现为生产函数中相应变量的系数为正值，合成的结果就是强劲的产出能力，使一个经济体具有更高的潜在增长率。然而，“生之者众”的人口结构特征不是永恒的。一旦劳动年龄人口在达到峰值后开始减少，人口结构特征就日益转变为“生之者寡”，上述各种与人口相关的因素或变量就会按照相反的方向影响经济增长，变量的系数就转为负值。这通常会通过劳动力短缺、劳动力素质改善速度放缓、资本回报率下降、生产率提高减速等，使潜在增长率下降。由此可见，并非从劳动力丰富这一个特征即可充分认识人口红利，也不能单纯观察经济计量模型中设定的代理变量（即人口抚养比）的系数作用，而需要认识到几乎所有增长因素或解释变量都反映出人口红利的作用。一旦了解这一点，我们就能够对以往研究中得出的诸多结论作出新解，即人口红利的解释。这样做，即便不算是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颠覆，至少可以使以往增长理论的新古典式的老生常谈增强一些解释力。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可以说是一位数十年如一日、始终如一地批评东亚经济模式和中国发展奇迹的学者。他认为，无论是当年的“亚洲四小龙”，还是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大陆，实现高速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的是生产要素（即资本和劳动力）的积累和投入，而全要素生产率并没有得到改善，因而统统算不上是增长“奇迹”，增长速度也是不可持续的。这里，关于资本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绝对重要贡献，克鲁格曼看得完全正确，然而，正如前面讨论的，这恰恰就是人口红利的表现。克鲁格曼并不了解人口红利的作用机制，所以作出符合理论预期却不符合实际经验的判断。此外，之所以在“东亚奇迹”和“中国奇迹”中看不到生产率的进步，也正是因为他没有从资源重新配置的角度观察生产率的源泉。

（作者：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来源：《人口负增长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挑战与机遇》第四章，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奋力开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局面

郭凤莲

为民谋利，为民造福，是基层党员干部的神圣职责

习近平总书记讲得好，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十八大以来，大寨村党总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团结带领全村党员干部，大力实施民生工程，让大寨人过上了富裕生活。近年来，我们立足大寨村实际，先后办了五件民生实事：一是完整保护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建筑风貌。我们日战大寨田，夜战新农村，先后修缮了石头窑洞 320 多孔、砖瓦房 470 多间。老百姓将这种“排排窑洞排排房”形象地称为“火车皮”，极具山西风格和历史特色。二是修复保护了“大寨田”。大寨田是辛苦田，当时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为了多卖余粮支援国家建设，无论是三伏酷暑还是数九寒天，大寨人从来没有停止过建设大寨田。我们开石挑土、垒修坝，硬是用勤劳的双手修整出 800 多亩标准的大寨田，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没有放弃。三是坚持不懈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六七十年代老一辈大寨人绿化了虎头山，90 年代至今我们又把 300 多亩荒坡荒山全部绿化。去年 11 月 9 日，省委书记蓝佛安到大寨调研时，看到大寨人在石头缝里栽种的树，由衷地赞叹：“你们真不容易啊！今日的大寨真是绿水青山、金山银山。”四是兴建了大寨新村。十年间新建了房屋 2.8 万平方米，人均 56 平方米，接入了天然气，彻底解决了村民供气、供暖问题；集体出资新建了老年活动中心，维修了学校，整修了村庄街道、水池水库。五是增加公共福利，提升了群众幸福指数。比如，120 平方米至 140 平方米的新建住房，每户只出了 5.5 万到 6.5 万元，其它由集体承担；供暖费用每年 52 万多，集体承担 40 多万元；每年发放养老金 4.6 万元、人口分红 52 万元、村民股金 48 万元、大学生补助 3.8 万元，支付管理人员劳务费 72 万元，过年过节福利 19 万元。现在的大寨人户户住新房、家家开汽车，幸福指数节节攀升。我们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五年三次考察调研山西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自身实际，真正落到了实处。群众幸福，人民满意，就是我们基层党组织工作的目标。

因地制宜，立足特色，为乡村振兴添活力

“食为政首，谷为民命。”这是 2021 年 12 月 8 日，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讲到的。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这一代人或多或少都有吃不饱、饿肚子的经历，更能掂量出 14 亿多人口的大国走到今天，粮食安全之于国家安全举足轻重的分量。”“越是有粮食吃，越要想到没粮食的时候。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决不能在吃饭这一基本生存问题上让别人卡住我们的脖子。”听到这些话，我不由想起大寨人战天斗地的日子。大寨立足的根本是什么？就是多打粮食，老百姓吃饱肚子，支援国家建设。大寨人也经常说“丰年要当欠年过，有粮常想无粮时”。这就是大寨精神、大寨文化，

就是一辈辈大寨人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我们深挖内涵，打好“大寨”牌，坚持把文化与经济、旅游、育人融为一体，发展农家乐 130 余家，举办了一系列文化活动及体育赛事，利用各种方式宣传大寨精神，讲好大寨故事，每年接待旅游人数达 20 多万。这些游客来大寨的目的就是追忆大寨的奋斗历史，看看大寨今日的变化，住住农家院、吃吃农家饭、拉拉家常，实地体验当地人的生活。不少游客与大寨村民交上了朋友，平时如果有需求，老百姓通过电商平台将大寨特色农产品寄出去，非常方便。同时，我们还聘请了农业专家，引进了一批优质高产、节水抗旱的新品种和经济作物，提升了商业价值和观赏价值，优化了种植结构，拓宽了增收渠道，让村民得到更多实惠。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作出大寨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蓝书记“大寨要打造美丽乡村，搞农家乐，搞旅游”的指示要求，以“促进群众增收，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继续做好“红大寨”这篇文章，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提档升级大寨虎头山 A 级景区，实施好民宿窑洞、梯田景观、奋斗剧目等项目，完善农家乐配套服务，打造大寨“两山”实践创新基地，依托大寨红色记忆乡村 e 镇建设，大力发展电商产业，让更多“大寨牌”农产品走出去、叫得响、销得旺，真正成为老百姓增收致富的“摇钱树”。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大寨始终与党同心同德、与人民同向同行。站在新起点，我们一定牢记领袖嘱托，沿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方向前进，奋斗不停步，整装再出发，坚决把大寨保护好、建设好、宣传好、发展好，奋力蹚出大寨特色的乡村振兴实践之路，为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大寨村党总支书记。来源：中国乡村第 3 期）

“后精准扶贫”时代的贫困：性质、成因及其治理路径

左 停 李 卓

贫困是一个不断变迁的学术概念，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会提出不同的内涵。笔者尝试从基本公共服务的视角来理解贫困，认为贫困不仅指的是收入不足，更表现为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或缺失导致贫困人口发展机会被剥夺和行动能力被限制而表现出来的多维行动困境。基于此，对贫困的再生产机制进行分析，发现不同类型的基本公共服务可以针对不同致贫原因的贫困人口有效发挥作用，因此，“后精准扶贫”时代我国应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减贫战略方向，实施以机会均等为基础的减贫战略，以保障公民获得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和机会，从而使其免于或脱离因机会剥夺导致的贫困。

一、问题的提出

按照 2011 年确定的贫困标准来衡量，我国已于 2020 年底实现了贫困县全部摘帽和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但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同时，绝对贫困得到历史性消除，并不意味着贫困在我国的消失，2020 年后贫困人口的性质和特征将发生新的变化。我国作为全球最大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还将长期存在。另外，由于兜底保障的有限性、贫困人口的脆弱性、贫困内涵的拓展和国际贫困线的调整等因素的存在，都决定着“后精准扶贫”时代我国的扶贫事业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减贫也将由消除绝对贫困转向缓解相对贫困。当前正处于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过渡的重要时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脱贫地区面临的首要任务，因为农村低收入人口的空间分布与绝对贫困人口的分佈基本一致，刚刚摆脱绝对贫困的脱贫人口仍属于低收入人口，依旧生活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或匮乏的农村地区，这一基本事实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这些人群的分佈基本上还是以脱贫攻坚时期国家划定的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主要片区，在大规模绝对贫困被消除之后，这些地区的相对贫困问题将会不断凸显。由此看来，农村低收入人口仍然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以及实现农村农民共同富裕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然而，当前由于新冠疫情的肆虐、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市场经济的波动和农民工整体素质不高等因素导致农民工就业面临诸多未知风险，这一群体的脆弱性依旧较高，在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一旦遭遇风险就会返贫或滑入贫困，这部分人口将成为预防返贫的高风险人群。但是，当前的政策实践相对滞后，一方面在于精准扶贫战略虽然实现了扶贫资源的精准配置，提高了扶贫资源的配置效率，也兼顾到了教育、健康和住房等维度，但总体而言，脱贫地区的人口所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市和东部发达地区相比，仍然存

在较大差距；另一方面，是因为精准扶贫战略的重点在于攻克绝对贫困，且主要针对的是已经陷入贫困的人口，并未关注到农村人口中的边缘人口和潜在贫困人口，即贫困治理理念主要以扶贫为主，未转换到“防贫”理念上来。在绝对贫困被消除以后，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或缺失导致的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将成为2020年后减贫的工作重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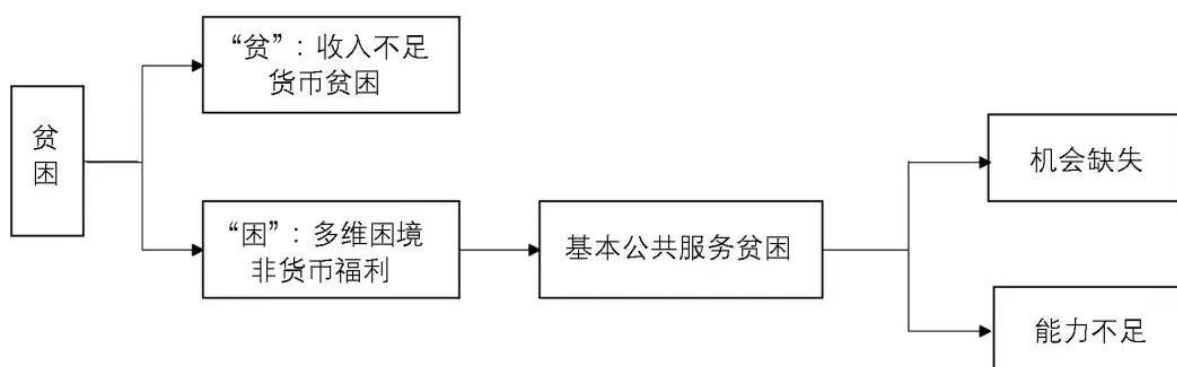
然而，在回顾既有研究和实践时发现，既有文献对脱贫攻坚实践中存在的精准识别问题、精准帮扶问题、“扶贫包干制”的建构与实践、贫困退出评估指标体系、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执行困境和贫困户满意度、健康扶贫和教育扶贫等展开了热烈讨论。同时，伴随着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一些学者已经对“后精准扶贫”时代的贫困治理问题展开了研究，如有学者认为按照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年的标准来测算，绝对贫困于2020年在我国得到历史性消除以后，并不意味着贫困在我国的终结，因为2020年后相对贫困人口将成为我国贫困人口的主体，而这些相对贫困人口的致贫因素是多元的，需要依据新的贫困发生机制，寻找更加有效的反贫困策略。面对这一新课题和新形势，有学者对脱贫地区农户融入电商价值链的增收机制和效应进行了分析，认为电商通过带动农产品销量和提高产品价格促进农民增收，还有学者在回顾和总结过去扶贫经验的基础上，提出2020年后我国的减贫应该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战略方向，以加强能力建设、发展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和加强社会保护等来进行治理，2020年后的减贫目标应该实现从过去制定不同绝对贫困标准并努力消除绝对贫困，转变为逐步通过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来缓解社会不平等。此外，一些学者也对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构建防贫监测机制进行了研究，如涂圣伟认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具有理念相同性和阶梯递进性，推进二者之间有效衔接应以改善全体农村居民的生计，促进其全面发展为根本导向，形成“以落实防贫保障为基础、夯实发展基础为前提、构建长效机制为关键、强化志智双扶为根本、推进产业升级为重心、衔接乡村振兴为目标”的框架体系，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总体来看，既有研究文献对精准扶贫理论与实践等前沿问题进行了有效回应，对如何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出了富有见地的观点，但尚未对脱贫地区农村低收入人口如何防范生活风险和促进内生能力建设的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在绝对贫困被消除以后，收入型贫困将会日益淡化，脱贫地区相对于城市地区和东部发达地区而言，仍属于欠发达地区。这些地区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或缺失而导致的多维贫困和相对贫困将会日益凸显，无法获得基本公共服务或享受服务质量较差的群体将会产生相对剥夺感，表现出内生发展动力和内生发展能力不足的双重状态，从而成为脱贫地区的低收入群体和相对贫困群体。学界的研究虽已关照到了这一人群，但主要集中在讨论贫困之“贫”，而未关注到贫困之“困”，即未对造成贫困人口陷入贫困的制度性原因进行回应。有鉴于此，本文在城乡融合发展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从基本公共服务的视角来阐释和理解贫困，认为贫困不仅意味着收入低下，还应包括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或缺失而形成的多维行动困境，并讨论基本公共服务视角下贫困的生成机制和减贫的层次，进而从基本公共服务视角出发来讨论2020年后的减贫策略，以期“后精准扶贫”时代如何缓解相对贫困和促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提供路径参考。

二、基本公共服务话语下的贫困：机会缺失与能力不足

贫困是一个复杂的学术概念，又是一个不断更新的概念，回顾人类反贫困实践和理论研究历史，发现人类对贫困的认知先后经历了绝对贫困、相对贫困、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等系列概念的变迁，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不同学科视角对贫困问题进行不同解释，并产生了一批富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对人类减贫与发展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伴随着人类扶贫实践不断发展，贫困概念也在不断拓展，实践者和研究者逐渐意识到人类福祉在很多方面无法用货币进行衡量，货币只是衡量贫困的一个重要维度，并不能完整地反映其他方面的问题。进而研究者提出了多维贫困的概念，期望从多个维度对贫困展开测量，并进行政策干预。多维贫困的代表人物是阿玛蒂亚·森，他提出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主要是指“一个人所拥有的、享受自己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实质自由，来判断其个人的处境”，即个体在特定社会结构中应该有足够的权利和自由来从事相关的功能性活动。同时，森指出收入低下是影响一个人可行能力被剥夺的重要原因，但并不是唯一原因，除收入以外，还有其他因素影响一个人的可行能力，进而决定真实的贫困。因为贫困的实质就是贫困人口缺乏改变其生存状况、无法抵御各种生存风险、难以抓住发展机会和不能获取经济收益的“能力”，这种能力包括享受健康、教育、饮水和住房等多个方面的能力，人们一旦拥有这种能力，就能够获得维持自身可持续发展的机会、权利与自由，从而摆脱贫困，实现社会公平与人的全面发展。因此，“贫困”一词在中文语境下的含义是多维度的，既包含货币维度的收入不足，亦包含非货币维度的福利缺失。

本文主要是从基本公共服务视角来阐释和理解贫困，主要突出强调的是贫困之“困”，这种“困”主要指的是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可获得性和机会不均等。贫困不能仅仅被视为收入不足，而应该被视为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缺失导致的一个人基本可行能力被剥夺而陷入多维行动困境的状态。从这个角度来讲，基本公共服务话语下的贫困内涵实质上包含“机会缺失”和“能力不足”两个层面的内容（如图 1 所示）。



“机会缺失”主要强调的是个体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无法享受到较强资源禀赋个体所拥有的生活质量的一种状态。此处强调的是公民获得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不均等或由于结构和制度的挤压造成部分社会群体无法获得基本公共服务，这在农村表现得尤为突出。公共服务维度的贫困可以体现在多个方面，包括财政投入、公共服务产出和公共服务的可及性等，且基本公共服务在区域间、城乡间和人群间的分布

呈现不均等，进而导致人们的温饱、安全、教育、健康和社会交往等需求的满足程度存在差异。“机会缺失”将会导致贫困人口无法实现这些社会功能性活动，这种状态可以表现为个体基本生存受到威胁、生活质量低下、身体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状况糟糕等单个或组合的社会功能缺失，使得个体作为人所应该享有的生存与发展权益受到严重损害，处于一种极度不自由的状态。

“能力不足”主要强调的是个体在实现社会功能性活动时表现出来的无能为力，即拥有更少的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源，且无法将其转换成可行能力。这种状态反映的是个人无法实现各种功能性活动和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本质上是缺少条件和平台实现能力转化，这种状态受到个体特征和环境因素的限制，往往在不同个体之间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个体特征主要包括健康、年龄和性别等，而环境因素则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个维度，自然环境包括地理条件、生态条件和自然资源等，社会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机会缺失和能力不足是个体与环境之间不断影响与互构形成的，这种异质性因素阻碍人们实现他们想获得的那种生活状态，从而表现出基本公共服务维度的贫困，外显为多维行动困境和内化为发展能力不足。

“机会缺失”和“能力不足”这二者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只有实现个体获取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均等”，才能有条件和平台实现“能力转化”，进而提升内生发展能力。因为能力是功能性活动的内化，功能性活动是能力的外显，实现社会功能性活动的多少体现的是个体能力的强弱，而能力的强弱却又是人们实现功能性活动和自由选择的保障。发展的首要目的是扩展人的自由，而影响人实现自由的因素主要有个体特征和环境因素两个维度，这两个维度之间的不断互构，所导致的弱势累积会阻碍人们获得他们想获得的那种生活状态，由此必须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来提升这些人群的内生发展能力，帮助其获得“发展的自由”。

三、基本公共服务视角下的贫困成因及其再生产

（一）基本公共服务视角下的贫困成因

贫困人口往往由于多种因素的叠加而陷入贫困，且这些因素之间相互影响，尤其是深度贫困人口，他们往往面临收入不足、健康状况差、信息闭塞、居住环境恶劣、自我发展能力弱和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等多重因素的限制，这些因素相互交织会形成一张纵横交错的网，而贫困人口在这张网中常常被边缘化，从而陷入一种无能为力的困境状态。精准扶贫实践从问题出发来识别贫困人口和致贫因素，一般将致贫因素归结为因病致贫、因学致贫、因残致贫和因交通不便致贫等。但如果从基本公共服务视角来看，造成这部分群体陷入贫困的本质原因在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或缺失，即基本公共服务贫困。因为在基本公共服务视角下，贫困成因可以被归类为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制度、基础教育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如表 1 所示），这些基本公共服务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人群之间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从而形成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的局面。这种分布状态已经对欠发达地区的脱贫人口形成了“机会挤压”和“能力剥夺”，导致他们陷入了贫困的“恶性循环”。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或缺失是贫困产生、积累和传递的重要根源。

精准扶贫话语下的贫困成因	公共服务话语下的贫困成因
因病致贫	公共卫生服务或医疗保障不足
因学致贫	公共教育不足或受教育机会不平等
因残致贫	残疾人公共服务不足
因交通不便致贫	基础道路和公共交通工具不足
因灾致贫	兜底保障不足或避灾机制不健全
缺资金	缺乏普惠金融支持
缺技术	职业技能培训或社会化服务不足
缺劳力	人力资本支持不足
自身发展动力不足	公共文化和教育不足

表 1 精准扶贫话语和公共服务话语下的贫困成因对比

脱贫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短缺已经成为制约这些地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一块短板。本文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减贫的理念，目的在于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念融入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和乡村振兴的实践中，通过补齐落后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短板，确保“底线公平”和实现“机会均等”，从而助力于缩小区域间、城乡间和人群间的差距，缓解因差距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冲突。从这个层面来讲，基于基本公共服务话语来理解和认识贫困成因，不仅有助于缓解相对贫困，还有助于促进脱贫地区乡村振兴和实现农村农民共同富裕。

（二）基本公共服务视角下的贫困再生产及其应对

要想攻克基本公共服务维度的贫困，就必须找准致贫原因，精准分析导致贫困的系统性因素，准确了解贫困地区人口的需求，有针对性地精准发力，才能弥补贫困地区发展的短板。在已经摆脱贫困的人口当中，“老弱病残”等特殊人群依靠兜底保障脱贫，这些人群具有较高脆弱性，是极易返贫的人口，而造成这部分人群风险防范能力弱的实质是基本公共服务获得性低，即针对这部分人群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缺失或不足。贫困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或缺失，会造成个体特征与环境因素之间的弱势累积，从而使贫困人口暴露在众多生存与发展风险之中，如失业风险、疾病风险和意外事件等，这些弱势人群在面临风险时没有有效的保障，导致其无法应对这些风险所带来的“灾难”，进而陷入贫困。陷入贫困的人口又常伴有收入低下、受教育程度低、疾病缠身、缺乏职业技能和人力社会资本弱等特征，在

一些公共服务被推向市场的条件下,这些特征又决定了作为弱势人群的贫困人口注定无法获得有效支持,或者获得的成本太高以至于贫困人口无法通过货币支付进行购买,这便会导致贫困人口无法获得与一般人群尤其是富人一样的服务,如优质的教育服务、医疗服务等,从而导致贫困人口缺少应对风险的有效手段,在遭遇风险时极易被推向贫困,进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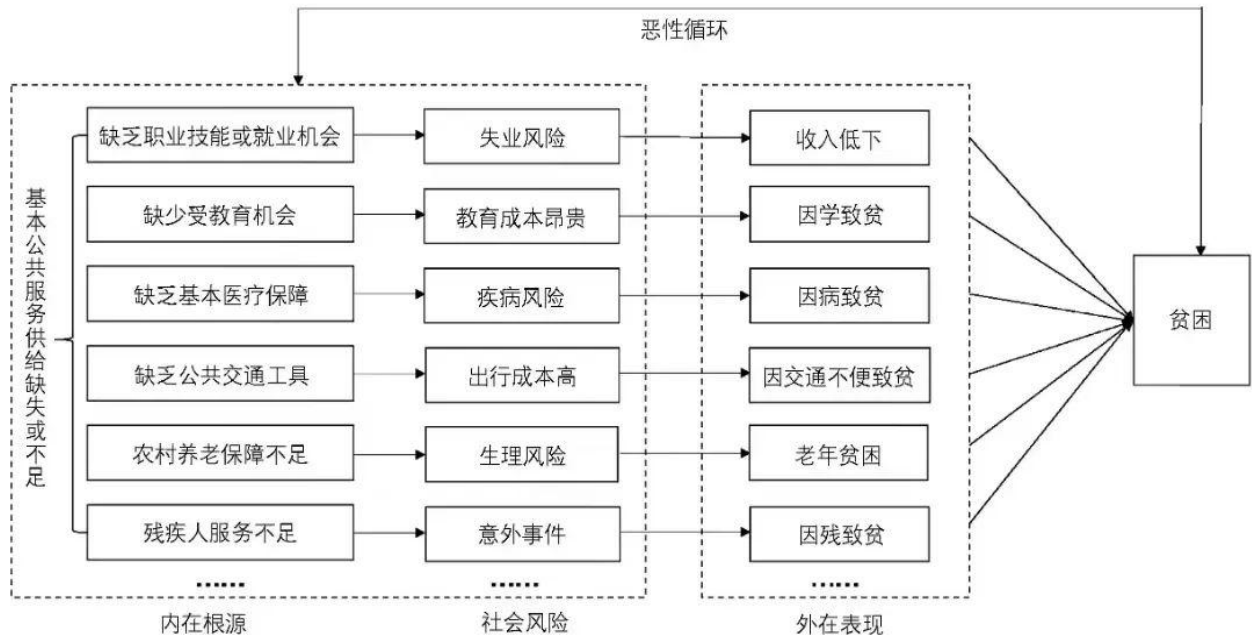


图2 基本公共服务视角下贫困的再生产机制

贫困人口在以上各维度表现出来的“被剥夺和被排斥”状态,实质上是贫困人口获得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没有得到有效保障,因生存和发展机会被剥夺而陷入多维社会困境,这与贫困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缺失高度相关。在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调研时发现,这些地区往往呈现出区域性和整体性贫困,自然地理条件极其恶劣,基本公共服务严重匮乏,可将其概括为“山高路远人稀地薄产不兴,健康教育住房交通全不行”,这些限制性因素被编织成了一张相互交织的网,限制了贫困人口的行动能力。

以上部分列举了造成贫困人口陷入多维困境的限制性因素,而这些因素在短时间内是无法彻底改变的,需要建立长效的减贫机制,才能帮助贫困人口提升福祉水平。经过长期的扶贫实践和理论研究,我国的贫困概念和脱贫标准已经转向了多维贫困视角,已经取得全面胜利的脱贫攻坚战,在识别贫困户时不仅关注了吃饭穿衣问题,还关注到了健康、教育、住房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问题,“就维度而言,基本公共服务减贫恰恰是由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多维贫困中各个可能遭受剥夺的维度而达到减贫的成效”。如果把贫困人口陷入多维贫困看作是对贫困人口福利的剥夺,那么基本公共服务减贫则是一个福利获得的过程。具体来讲,可以将基本公共服务划分为四种类型:兜底型基本公共服务、孵化型基本公共服务、延伸型基本公共服务和发展型基本公共服务,这四种基本公共服务可以在减贫中针对不同类型的贫困人群发挥不同的减贫作用(如表2所示)。

基本公共服务类型	不同类型的贫困人口	减贫的层次
兜底型基本公共服务	无劳动能力或因重大灾害陷入极端困境	构建社会安全网，为其提供兜底保障和防止返贫
孵化型基本公共服务	有劳动能力和发展意愿，但缺少社会支持	重新发现贫困者个体价值，为其“起飞”创造条件
延伸型基本公共服务	受制于环境制约，但具备发展能力与发展意愿	提升贫困人口的解困能力，实现功能上的延伸与拓展
发展型基本公共服务	享受教育、健康服务不足或质量较差的群体	增强发展能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并实现内源式发展

表 2 不同类型的贫困人口与基本公共服务减贫的层次（注：此表为笔者自制）

基本公共服务在减贫中所发挥的功能可划分为四个层次：一是兜底型基本公共服务能够直接回应和解决贫困人口的基本需求，有效预防贫困人口面临的风险，并为贫困人口提供兜底保障，防止贫困人口因疾病或灾害的侵扰而陷入贫困；二是孵化型基本公共服务主要基于优势视角，重新发现贫困人口的价值，充分挖掘贫困人口的优势资源，并进行“孵化”，即为其就业和创业提供机会与平台，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起飞”的基础性条件；三是延伸型基本公共服务能够增强贫困人口的解“困”能力，减少交通、居住环境和信息获取等因素对贫困人口的限制，帮助改善贫困人口生存的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从而通过减少社会排斥和降低贫困人口的脆弱性来实现减贫；四是发展型基本公共服务可以帮助贫困人口进行能力建设，有效提高贫困人口的“基本可行能力”，并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从而提升贫困人口的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增强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和自我发展能力。

如上所述，2020 年底我国虽已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但 2020 年后相对贫困问题将会日益突出，贫困人口的被剥夺感会更加明显，因为目前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尚不健全，存在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人群差距，不能全面覆盖脱贫地区低收入人口生存与发展的各个方面，与城市地区和发达地区相比较，农村低收入人口在获得基本公共服务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任重而道远。因此，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阶段，以及未来实现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的阶段，需要更加重视补齐农村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短板，更好地帮助农村低收入人口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

（三）基本公共服务减贫：“后精准扶贫”时代的减贫路径

从理论上讲，只要人类社会分化和阶层分化不消失，贫困就不会消失。由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消除，并不意味着贫困在我国的消失。由于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等原因导致的相对贫困问题将会长期存在，“后精准扶贫”时代我国农村贫困将进入一个以转型性次生贫困为特点的新阶段，这种转型性的次生贫困不同于绝对意义上的温饱型贫困。因此，基本公共服务视角下的贫困治理，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1、及早启动新贫困标准的制定工作

上文从基本公共服务视角对贫困进行了重新阐释，在历史性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新贫困标准的制定将是绝对贫困被消除以后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因为这事关贫困人口规模的

估算、贫困人口特征与分布等减贫的方向性问题。回顾我国扶贫实践与经验，参照国际减贫标准，2020年后我国新贫困标准的制定就是三种形式：更高的绝对贫困标准、新的相对贫困标准和多维贫困标准。无论采纳哪一种贫困标准，都需要结合国家的发展阶段和基本国情做出严谨而科学的判断，依据党的十九大报告绘制的发展蓝图，即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50年，“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基于此，“后精准扶贫”时代的减贫战略应该更加重视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减少贫富差距，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促进脱贫地区乡村振兴有机结合，将体现权利和机会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纳入缓解相对贫困的框架体系。并且，贫困概念的界定和贫困标准的设定，一定要体现以保障公民公平获得基本公共服务为核心内容，这将有助于确保底线公平和促进社会正义。同时，需要强调的是新贫困标准的设定一定要强调城乡统一，但在具体维度和指标的设定上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制定科学合理且能够全面反应新时代贫困人口真实状况的贫困标准。

2、加快构建城乡一体化的贫困治理体系

2020年，我国历史性地消除绝对贫困之后，农民工贫困问题和城市贫困问题应该受到重点关注，因为这些人群将会成为潜在贫困人口。同时，还要继续关注因病因残致贫等特殊人群与边缘贫困人口，做好防贫监测工作，以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防止新的人群滑入贫困。所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应该成为“后精准扶贫”时代减贫的战略方向，但这一扶贫战略实施的组织基础是必须构建起城乡统筹的贫困治理体系。城乡贫困治理体系的建立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协同治理，构建起以国家乡村振兴局牵头，其他各部门协同参与的城乡贫困治理框架，赋予国家乡村振兴局更高权限，以便更好地发挥组织协调功能；国家统计局需要尽早建立起城乡统一的贫困识别标准、统计口径和监测机制，建立城乡贫困人口信息共享数据库，打破目前城乡贫困人口统计的二元分割，实现数据共享，以方便进行协同治理；要尽快启动反贫困立法的论证工作，将反贫困纳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推进乡村振兴的基本职能，将“非常规工作”常规化，以此推动反贫困工作的制度化；另外，对脱贫攻坚期内取得的制度经验进行总结，做好与乡村振兴的政策衔接、制度衔接和体制衔接，以此助力于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拓展和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

3、实施以机会均等为基础的公共服务减贫路径

回顾我国的减贫历史发现，我国扶贫政策的目标在不同阶段发生了变迁，遵循着“保生存—降风险—促发展”的基本逻辑。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我国政府采取了多种扶贫举措，已经取得了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当前正处于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过渡的关键时期，需要认真做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工作，从制度和政策层面建立起长效帮扶机制，有效预防农村低收入人口陷入贫困。同时，“后精准扶贫”时代需要实现贫困治理理念的转换，从发展主义的“强干预”转向服务主义的“软干预”，即需要加快构建起基本公共服务减贫的基本框架，将基本公共服务减贫融入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具体实践中，并在顶层设计和具体实践层面出台相关制度，以保障基本公共服务能够真正服务于贫困人口。因为基本公共服务对于人们的生活福祉具有基础性和全面性的作用，建立起保障贫困人口权利公平和机会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仅是确保贫困人口获得发展的基础性条件，更是实现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因此，在“后精准扶贫”时代政府应该实施以机会均等为基础的减贫路径，将减

贫目标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具体维度相挂钩，建立起旨在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人群差距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保障城乡贫困人口在享受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卫生和住房安全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4、构建科学的基本公共服务减贫评估体系

基本公共服务减贫并不是一个自发实现的过程，一般需要采取逆非均衡化的政策与资源投入，并配以严格的监督考核体系才能实现减贫目标。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需要在乡村振兴考核评估体系中增加基本公共服务减贫的评估指标，这对加快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非常必要。基本公共服务减贫评估体系的建立有助于衡量基本公共服务减贫的政策效果和减贫质量，确保贫困人口真正受益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增加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考核指标有助于优化目前“中央—地方”政府在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上的财政投入机制，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此外，将基本公共服务减贫纳入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中，对地方政府的工作将具有导向作用，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工作的积极性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主动性，实现减贫成效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因此，构建基本公共服务评估体系是乡村振兴背景下缓解相对贫困不可或缺的制度体系，因为只有科学的评估制度才能更好地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成效进行评估，以促进脱贫成果的稳定性和乡村振兴考核评估机制的不断完善，这对“后精准扶贫”时代的乡村振兴实践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四、结语

在精准扶贫战略的不断推动下，我国已于2020年底历史性地告别了绝对贫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贫困在我国的彻底消失，因为贫困还具有相对性。世界银行按照国家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的不同，划分了不同的绝对贫困标准。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持续提高，我国已经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在更高的发展阶段将需要采纳更高的绝对贫困标准。而且，当前正处于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阶段，防止规模性返贫是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2020年后应该更加重视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帮扶和脱贫人口的防贫问题。并且，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背景下，2020年后应更加重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即需要更加关注发展不均衡和不充分引发的城乡发展差距大、贫富差距大和社会不平等问题。自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制定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促使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后精准扶贫”时代要接续推进脱贫地区的乡村振兴，就必须将基本公共服务纳入乡村振兴的工作范畴，在进行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时，应该充分结合乡村振兴战略，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来促进相对贫困问题和发展型贫困问题的解决。基于此，“后精准扶贫”时代，应该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区域发展差距和贫富差距为落脚点，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抓手，来提升脱贫地区农村居民的内生发展能力和内生发展动力，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发生和促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

（作者：左停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专家委员，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卓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来源：《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吴象千古

丁 东

2021年5月18日11时57分，吴象先生与世长辞，享年100岁。

吴象是安徽休宁人，生于1922年1月。1933年入安徽省立第二中学读书，1937年在南京安徽中学读高中。1938年秋，赴延安参加革命。曾任新华社记者、《人民日报》记者、编辑、《山西日报》总编辑、山西省委调研室主任兼副秘书长、安徽省委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职。他笔墨生涯逾七十年，有《阳关道与独木桥》《昔阳到凤阳》《伟大的历程》《中国农村改革发展历程》《大写的人》等著作存世。他没有做过封疆大吏，却以自己的文字推动了改革进程。最精采的篇章，莫过于在中国农村改革之初，协助万里，为包产到户破冰启航呐喊。当时，党内高层发生了一场大辩论，一方主张农业集体化是不能动摇的金科玉律，力主坚持农业学大寨，一方认为包产到户增产增收的效果立竿见影，让农民吃饱饭更重要。历史已经证明，人民公社不是阳关道，包产到户也不是独木桥，它不仅是农民填饱肚子的权宜之计，而且是把生产经营权利归还农民的根本性变革，是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重要突破。在历史转型的当口，吴象一方面独立运思，发表了影响世道人心和政策走向的多篇署名文章，如1980年11月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长文《阳关道与独木桥》；一方面倾力参与制定赋予改革合法性的政策规定，如1982到1986年的中央“五个一号文件”。他做出独特历史贡献，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中国的改革，从农村突破，起步于安徽，急先锋是省委书记万里。吴象到万里麾下做文胆，风云际会，具有偶然性。但此前他已经意识到昔阳之路行不通，深受挨整的切肤之痛，所以甘冒风险，义无反顾，追随万里为民请命，让农民从饥寒中绝境求生，具有必然性。两年前，我参加吴象两部新书出版座谈会，亲耳聆听多位亲历农村改革高端决策的当事人，提起吴象的道德文章，无不表示由衷敬佩。

哲人其萎，华章永在。

我有幸和吴象先生相遇在49年前。当时我是一名普通知青，从北京来到山西沁县插队。进入下乡第三年，不免为人生的出路焦虑。父亲已经去世，母亲是北京31中学的教学辅助人员，家庭没有任何关系可以依靠。1972年正月过后，我结束探亲回到沁县，惊喜地收到通知，让我到省委调研室报到。对我来说，真如同天上掉下来一个馅儿饼。

原来，省委书记曹中南提议，在大学选拔工农兵学员之前，省委调研室从全省挑选十名北京知青试用。吴象派员分三路考察。其中一路来到沁县。我当时不在沁县，县委郭同德却推荐了我。我因喜欢动笔，此前在《山西日报》发表了一首豆腐块大的小诗，还有一些稿子存在郭同德处。郭同德介绍了我的

情况，提交了我的文稿，最后竟被调研室选中。试用十个知青的计划最后落实了九名。我们以借调的方式进入机关实习，一年后，录用为国家干部。前几天，我认识了作家陈世旭，他是1964年初中毕业下乡的老知青，七十年代初知青点只剩下他一人，一个好心的老干部推荐他参加县里举办的工农兵通讯员培训班，此间他在《江西日报》发表了一篇数千言的报道，命运从此改变。说起提携他的人，至今充满感激。陈世旭的回忆引起我强烈共鸣。如果没有郭同德推荐，没有吴象和调研室其他同事秉公办事，量才用人，给我这个机会，我结束知青生涯不知还要费多少周折？

吴象是我进入省委机关接触的第一个领导。当时他年近五旬，行政11级，在山西是数得着的高干。在我们报到之前，他亲自参与为我们准备的集体宿舍打扫卫生。他反对称官道衔，人们一律称呼他“老吴”。他提倡读书，鼓励思考，平易近人，与人为善。同事们尊敬他，不是因他官大，而是因为他水平确实高，文章确实好。后来，山西省委调研室被打成“裴多菲俱乐部”。这个机构在吴象治下，有许多不同之处。

一是吴象识才爱才。他调来的干部普遍知识水平较高，不少是全省有名的笔杆子。1970年，老五届大学毕业生一概分配到基层，许多人才得不到施展。吴象和副主任张恩慈借批林批孔成立写作组的机会，把一些颇具学术天赋的大学毕业生收进调研室。后来，好几位成为国内学界名家，如学术史家刘梦溪、经济学家刘树成、历史学家阎守诚。

二是吴象积极反左。我刚到调研室工作，就赶上周恩来提出批极左，当时山西省委书记谢振华积极响应。吴象在调研室付诸政策研究，派员分赴工厂农村，写出多篇调研报告，提出纠左的政策建议。可惜不久毛泽东对王若水的信做出批示，使这一波纠左努力流产。

三是内部气氛宽松。吴象从新华社系统得到内部消息，常在室内吹风。讨论政策问题，不分职位高低，平等争论。我当时年轻，刚进机关，对于政策研讨尚不入门。受到的熏陶，至今难忘。

如果说，和吴象共事的开端是一段难得的幸运，共事的结束，则是一段伤感的记忆。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抓捕，吴象本来非常高兴。此前他多次流露对江青的反感。没想到，山西清查“四人帮”另立标准，以对陈永贵、谢振华的亲疏划线，确定清查目标，吴象竟然被打成了“四人帮帮派体系在山西篡党夺权的代理人”。当时调研室的办公地点是省委西院十号楼，现在是晋商博物馆的一部分。这座四方形的二层小楼一角，成了关押吴象的场所。几个月不准吴象回家，家属送饭也不能见面。后来调研室被解散，吴象被发配到百里外的交城省直五七干校劳动，继续审查。直到1978年夏，才允许他到北京瞻仰毛主席纪念馆。到北京以后，他就和抗战期间在太行山共事的《人民日报》老领导安岗、李庄联系，寻求解脱之道。同时得朋友帮助，住进同仁医院治病。

这时，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正要率团到美国访问。吴象1966年6月就认识万里。他调到《北京日报》担任副总编辑，万里当面拜托他，我这个名字绝对不能见报，不管什么东西，一定要撤掉。万里到安徽主政时，文革中的两派闹得不可开交。省委决定，找原籍安徽，多年在外地工作，和两派没关系的干部回来工作。吴象原籍安徽休宁，正在考虑之列。万里说，我要出国，不能跟你谈了。你找赵守一，是我们第三把手。赵守一对吴象说：我们的一致意见是，你不要再回太原了。回太原不知道王谦放不让你

走。不放你走，硬扣着你，比较麻烦。你赶快走，就有办法。吴象说，党的介绍信都没有。赵守一说，你真是个书呆子，山西是共产党，安徽就不是共产党了？我们省委组织部给你发调令。吴象说，保险柜的钥匙还在我手里，我还要去拿几件衣服。赵守一说，你悄悄去，悄悄走。千万不要再和王谦纠缠了，你纠缠不过他。你是一个党员，山西省委是党的高级组织，完全有权力处理你。你在山西，把你摁到那里，没人救你，救不了。你到安徽，我们给你任命了，你就是我们的干部了。你的问题，就变成两个省委对一个干部的不同看法，我们就有发言权了。

吴象回到山西，果然被赵守一言中，扣着不让走。万里看到调吴象有阻力，只好找胡耀邦。胡耀邦开会时亲自找王谦说，让这个人到安徽去。王谦说，他有很严重的问题，现在还弄不清楚。胡耀邦说，那好，你把材料交给中组部，中组部负责审查他的问题。王谦这才松口。

吴象离开山西，有如蛟龙入海，书写了一生最灿烂的华章。

吴象离休以后，我又和他又有若干交往。

凤凰卫视曾开设口述历史栏目，马立诚邀我担任顾问。讨论选题时，我提出请吴象回忆五个一号文件的产生。后来这个节目顺利开播，受到欢迎，也为吴象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李辅曾在调研室担任吴象的副手，后来经历十分坎坷。我建议他撰写回忆录，他完成了，取名《所思所忆七十年》。我们来到中日友好医院，李辅面请吴象作序。吴象当时重病在身，耗时数月，为李辅写成数千言的长序，让人感动。

吴象的晚年的朋友圈主要是和《炎黄春秋》相关的同龄人。他和杜润生、于光远、李庄、朱厚泽等曾经共事，志趣相投；和李锐、何方、杜导正、李慎之等同气相求，共识颇多。他写了追忆胡耀邦、项南、杜润生的力作，还想写一篇回忆万里的长文，可惜疾病摧残了身体，力不从心，留下永远的遗憾。

吴象晚年，也遇到了出版难题。他将部分回忆文章编成文集，取名《好人一生不平安》，由邵燕祥作序。我曾尽自己所能，为这本书的付梓斡旋。出版后，他签名赠我留念。

儿女将他的回忆文章编成文集《大写的人》，送我一阅。我当时正在《炎黄春秋》参与编辑工作，看到吴象为这本文集写的自序很有分量，且是他生前定稿的最后篇章之一，于是编发出来。这成为我和吴象最后的文字因缘。

吴象千古！

（作者：学者。来源：爱思想网 2023 年 4 月 7 日）

99 岁院士开公号：早已想通生死，但害怕与社会脱节

田瑞颖 徐可莹 朱献东

近日，99 岁的任继周注册了微信公众号，取名为“草人说话”。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草业科学奠基人，与草打了一辈子交道，自称“草人”。

就在不久前，任继周感染了新冠，他笑称早已想通生死，但害怕与社会脱节，尤其对农业的发展，“总感到有很多话要说”。

为了提醒自己“争分夺秒”，他家中每个房间都摆挂了钟表。但在金钱上，任继周却是一个“月光族”，目前为止，他已捐款 300 多万元，在 4 所大学设立了草业科学奖学金，“我早已‘非我’，所有的东西都是社会的。”

日前，他为即将出版的《中国农业伦理学》作序，自己在电脑上敲出 4000 多字。面对《中国科学报》的邀约，老先生熟练地用微信回复道，“即日即来，来前电话”。



2023 年 2 月，任继周在家中接受采访。朱献东摄

一、“我总感到有很多话要说”

《中国科学报》：您为什么要注册自己的微信公众号？

任继周：一个人特别是老年人，怕孤独，一孤立于社会就没有生趣了。那怎么跟社会联系呢？我说开公众号吧，但过去怕干扰太多，发个东西各种评论干扰你

现在我太老了，也写不成论文了，我想说说话还是可以的，而且我总感到有很多话要说，就设了个公众号。最近我就在想生态文明的农业问题、草业问题。

《中国科学报》：去年年底您感染了新冠，害怕吗？

任继周：想通了。我想得开，心情非常开朗。到这个年龄了，又要死人的话，你不死谁死（大笑）。

2020年底我突发窒息性哮喘，抢救之后记忆力、听力大幅度下降，这次新冠后就更不行了，唯一值得安慰的就是思路还算清楚，没有糊涂，简单交流还可以。

《中国科学报》：您为什么称自己“草人”？

任继周：就是因为（我像草一样）在最底层，最不起眼的地方，好好地扎下根做工作。

草这个东西，陆地上只要有生命，几乎无处不在。草在地面上看起来是很小的，实际上根是很深的，我有一句诗：小草贴着地面生长，根却扎到株高许多倍的地方。草潜在的东西很多，而且很复杂，任何地方都有特殊类型，能适应各种条件，草几乎是生态系统的底色。

另外，草是见缝插针，不与人争。我这一辈子是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也不跟人争。你哪个专业红、热门，我不考虑，我就坐我的冷板凳，一坐就是几十年。

《中国科学报》：公众号上发的4000多字《中国农业伦理学序》，是您亲自写的吗？

任继周：是我自己用电脑打的，有青年同志帮我排版发。我写日记，写文章都用电脑。

《中国科学报》：您为什么强调农业伦理？

任继周：我最初的心愿在改善国民营养，多吃点肉，喝点奶。但跑农村、牧区十多年，发现问题发生在农业结构，所以进行农业生态系统的研究，然后发现“三农问题”也不全是农业结构的问题，是农民、农村没有与市民取得同等地位。

我把中国农业的发展分成两大段：改革开放前的30年是小农经济变大计划经济，农民在底层，很苦；改革开放后的40年是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贫富差距加大，有人暴富，如房地产商，但农村处在污染链的终端，水污染、土污染、食物污染，风险还是农民、农村承担。

我倡导农业伦理学，就是想把这个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改正过来。农业是基础，一个国家不管多大，发展到什么程度，农业弄不好，一切免谈。

二、“‘我’早已不存在了”

《中国科学报》：您年少时经历了很多战争，这对人生有怎样的影响？

任继周：我父亲是个旧军官，保定军校二期（与蒋介石同期），但他骨子是文人思想，很爱国，与那些旧军官的旧习气格格不入，在国民党军中属“另类”，所以只当上了虚衔少将。

抗日战争爆发后家乡沦陷，我一直跟着父亲在长江沿线转移就学，亲眼看到中国伤兵从战场退下来，他们在校园的地上休息。这支血肉模糊的队伍离去后，留下满地血渍，我心里难过极了，这个悲惨记忆，无法忘怀。

当时光是难过，没有更高的想法。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感到有负罪感、原罪感，我这条命是几千万人保护来的，血肉长城啊！

我现在所有生存的日子，所有的工作，就是这些人的恩赐。我把自己全部作为对这些烈士的回报也不够，我应该是他们的一员。“我”早已不存在了。

《中国科学报》：您为什么选择研究草业？

任继周：我大学的第一志愿是畜牧兽医。中国人营养太差了，我自己都病得要死，大学毕业时才45公斤，是个病夫，这样的国民撑不起强国，我想必须改善国民营养。

《中国科学报》：您怎么评价自己过去70多年的工作？

任继周：基本没有浪费时间，总体上是满意的，但缺点比满意要多，失败更多于成功。我曾经面对许多误解和无知，我要是心眼小一点的话早活不成了，受的那些委屈，碰的那些钉子，全当精神垃圾，统统忘掉了。

我的工作是一心尽力，我们全家人都没有想过“升官发财”。1942年国民党时期，我们兄弟三个（二哥哲学家任继愈，三哥经济学家任继亮）最后在重庆聚会，就约定不入军政两界，不做官，不发财，做个有正气的人。

《中国科学报》：您书房里一直挂着任继愈先生赠予的“涵养动中静，虚怀有若无”一联，您怎么理解它？

任继周：这是二哥写给我的，也是我晚年的座右铭。1995年我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他看我忙得一塌糊涂，就给我写了这幅对联。

“涵养动中静”是提醒我不管外头多动乱，心里要平静，这一点非常要紧。“虚怀有若无”是说你贡献再大，在无可穷尽的大自然中，这点贡献可完全忽略不计。

三、“月光族”

《中国科学报》：为了推动我国草业科学发展，您捐赠了300多万，在4所大学设立草业科学奖学金，是怎么考虑的？

任继周：我早已“非我”，所有的东西都是社会的。我老伴2019年去世以后，我把她攒的养老钱全捐了，陆续又捐了4个草业科学奖学金，尽管数额小得可怜，但表达了我的心意。我现在是个“月光族”。

《中国科学报》：您一生热爱读书，最喜欢的书是什么？

任继周：《鲁迅全集》。我在“文革”被批斗的时候，别的书都没法看，《鲁迅全集》看了两遍。鲁迅这个人脑子太清楚，眼光犀利。你看那《狂人日记》，真是深刻。

《中国科学报》：您现在每天工作多长时间？

任继周：正常的话我每天可以工作5个小时，上午要处理膀胱痿管等，大概工作2个小时，下午3个小时。

我时间抓得很紧，我二哥（任继愈）送我上初中时就跟我说：“计划领先，分秒必争。”我在90岁前后是两年一个计划，不敢做三年，怕第三年就没了（大笑）。

我现在的计划就是在这两年内把生态文明的草业及农业伦理特点想清楚。

《中国科学报》：您长寿的秘诀是什么？

任继周：就是“心无旁骛”和生活规律。

我每天晚上9点睡觉，过去是6点半起床，然后做工作。两次生病后，睡眠不好，就没有一定规律了，但还是基本8点前起床。

当然，“心无旁骛”就是少考虑自己，前面总有一个等着我完成的目标。

《中国科学报》：如果您对科研后辈们说几句话，您最想说什么？

任继周：要真正从思想上把“小我”融入“大我”，把“他人”视做“他我”这是最要紧的，不要总想着我、我、我。

要学点哲学。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非常重要，离开历史条件就看不清问题；离开唯物辩证法就只看到了破碎的世界，看不到整体。

要懂至少一种外文。外文不仅是工具，还内涵思维方式。

另外，总有前景、计划在召唤，直到生命的终结。只要活着就往前走，人生没有终点，“路倒”（注：赶路时倒毙路上，指工作至最后一刻。）是最幸福的结局。

（作者：中国科学报记者。来源：中国科学报，2023年2月22日）

江苏华西村：以百姓为中心，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华西村供稿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于2022年12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强调：“要铆足干劲，抓好以乡村振兴为重心的‘三农’各项工作，大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而努力奋斗！”江苏华西村建村62年来，创造了令人称道的发展奇迹，成为实现全面小康的先进典型。2019年7月26日，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进京出席了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并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总书记握着吴协恩的手高兴地说：“华西村乡村振兴搞得真好！”近年来华西村加快了转型升级、创新发展步伐，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宽。华西的发展成就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充分表明了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无比准确性，充分印证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共同富裕路径的切实可行性。华西村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集体经济

华西村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坚实保障在任何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华西村都坚持解放思想，从华西实际出发，把贯彻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坚定性与因地制宜发展的创造性有机结合起来，通过上世纪七十年代造田、八十年代造厂、九十年代造城以及新世纪育人，实现了从农业样板村到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再到农村现代化的一次次跨越，走出了一条农村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合作双赢、共同富裕的发展新路，开创了超大型村庄民主管理体制建设的先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别的地方“抓革命、促生产”，华西村提出“抓生产、促革命”。八十年代初，全国大多数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华西村提出“集体重工抓粮，个体修补种养经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华西村结合人多地少以及已经实现集约化、机械化、规模化经营的实际，提出发展集体经济、调整产业结构，把全村600多亩粮田集体承包给村里的30名种田能手，把绝大多数劳动力转移到企业工作。1984年底，华西村动员村民把年终分配的钱作为投资建厂，入股分红，从此逐步形成了具有华西特色的“集体控股、个人入股”的新型股份制集体经济制度，村民不仅可以上班挣工资，而且可以按股分红。1992年，全国很多地方掀起了乡镇企业改制的浪潮，提出“抓大放小”，华西村则根据本村情况实行“抓大扶小”，特别是重点推行“一村两制”：既可以搞集体，也可以搞个体，但为了防止公私不分和损公肥私，村里规定不能“一家两制”，更不能“一人两制”，使华西村走出了一条以集体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多元化、混合型经济发展新路子。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华西的发展，首先离不开吴仁宝老书记，他是创始人，也是改革者，他一辈子把让老百姓幸福，当成自己最大的幸福，毫无保留地将一生献给了“三农”事业。他用改革实践证明了社会主义可以富华西，从而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老书记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的荣誉称号。习近平总书记也一直非常关心华西的发展，2003年他视察华西时评价：“华西巨变和腾飞的背后，原因是坚持了两个始终：始终高举旗帜、始终坚持发展，这是华西永远保持领先的一个基本经验！”2011年底，中央政策研究室调研了华西的党建工作，

并总结了六条经验：一是“吃透两头、两头一致”，走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特色发展之路；二是“共同富裕，但不一样富”，用科学机制激发农民群众创造活力；三是“既富口袋，又富脑袋”，不断增添创新创业创优的精神动力；四是“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建设环境优美的宜居家园；五是“唯才是用，关键在用”，充分发挥各类人才的支撑作用；六是“有福民先享，有难官先当”，打造为民务实清廉的坚强领导核心。2018年初，中央政策研究室再次调研了华西的经济发展、村庄建设以及村民生活等，调研报告中称：华西村发展情况很好，经济平稳、转型成功、总体健康。经济结构合理、村庄和谐有序，村民当家做主生活幸福。华西村党委领导有力、工作得力，落实党中央精神坚定不移。华西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一面旗帜！

2、产业多元

华西村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强大基础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3年吴协恩担任村书记之后，为了进一步提升华西人的小康生活，针对长三角地区出现用工荒、环境污染加剧、土地成本提高等新情况，提出“数量转质量、体力转脑力”的转型发展思路，推动产业向三产服务业的布局。一方面，加快钢铁、化纤等传统产业技改升级且坚持不扩产，下决心逐步关停部分企业。至今，陆续关掉了普线、带钢、棒材等10家能耗高、效率低的企业，钢铁部分去产能130万吨，相当于原有产能的三分之一，同时关掉了2家热电厂，每年减少原煤消耗21万吨。另一方面，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与多所院校合作，成立了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在华西山北，建立了高品质稻米种植基地，学习日本技术，种植2000亩地，成功创建“省级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在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的同时，华西村积极拓展旅游服务、仓储物流、远洋海工、农产品批发市场及矿产资源等一大批新兴产业。自2021年1月开始，华西按照“坚定、积极、稳妥、彻底”的原则，实施新一轮改革，推动创新机制、优化管理，增强竞争力。华西以村企分开为根本，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021年7月19日，华西产业集团成立；10月10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高票表决通过设立。现在，企业、村委、合作社权责职能分开，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华西的产业目前主要分为三个板块：钢铁板块、产业集团板块、村委合作社板块。华西现在就是传统产业、服务业、高科技产业“三个板块”齐发力，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并排跑。2022年，华西交税7.76亿元，为国家做出了贡献。

3、富民强村

华西村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路径老书记吴仁宝生前常讲，一人富了不算富，全村富了才算富；一村富了不算富，全国富了才算富。带动更多的人实现小康，是华西村一直以来追求的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华西村更加注重强化村民的综合素质、提升生活品质。特别是打造“10米场景圈”，组织党员群众晒家训、说家规、传家风。通过乡贤文化、主题公园、道德讲堂、村规民约等，传递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观念。每年评选文明家庭并张榜公布，促使大家向先进学习、向优秀看齐。村党委每年通过重大节庆，以及半年度或全年度评优树模，营造“比学赶超”的氛围。老书记吴仁宝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就给自己定下了“三不”规矩：不拿全村最高工资，不拿全村最高奖金，不住全村最好的房子。从2013年开始现任村书记吴协恩也不拿奖金，只拿每月3500元的基本工资，上级这些年来批给的奖金至今已有1亿元，全部留给了集体。最初的华西村只有0.96平方公里、667人，随着帮带周边村，如今的华西已有35平方公里、30340人，再加上2万多名外来职工，目前已超过5万人。为更大范围地调动大家的积极性，2017年开始华西村实施“三项改革”：用人改革、制度改革、股份改革，不分本村村民、外来职工，通过规范竞聘，体现公平公正；通过同工同酬，打破“大锅饭”；通过定岗定薪，做到“一个萝卜一个坑”，让所有人有更多的认同感、获得感、幸福感。在缩

小并入村与中心村的发展差距上，华西加大投入力度，建设基础设施，改善村容村貌和村居条件。十一村党支部原书记唐龙彪说：“华西坚持共同富裕，不是吹出来的，是实打实干出来的。13个并入大华西的村，当初都是集体经济收入不足万元的贫困村，目前村民人均收入已从6000多元增长到了现在的三四万元。村里每年支出1亿多元发放粮食补贴、各项福利、养老金，还特别照顾困难家庭，不能劳动的每月有最低生活保障，困难家庭孩子上学有补助。”华西村富了“三不忘”：不忘国家、不忘集体、不忘左邻右舍及经济欠发达地区。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华西就配合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一带十、百带千”的方法，先后为中西部地区举办了100多期培训班，直接培训了1万多名干部、带动10万人脱贫致富。九十年代中期，华西又通过派干部、带资金、带技术、带项目，远赴宁夏、黑龙江援建了两个“省外华西村”。1999年建成后，无偿移交给当地政府。像宁夏华西村，是宁夏开展“移民吊庄”工程时，华西前去援建的。到了九十年代末，老书记又提出“扶贫先扶志，扶志先育人”“输血不如造血”的扶贫理念，这与中央近些年强调的“要坚持扶贫同扶智、扶志相结合”是完全一致的。2001年开始，华西按照行政建制不变的原则，逐步将周边20个村作为直接带动对象，纳入共同发展。2006年至今，华西又与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开展互学交流，进行“智力扶贫”，通过开展大学生村官、新型职业农民、少数民族村官等培训班，累计培训农村基层干部50多万人次，把致富经验传向全国，为决战脱贫攻坚作出了积极贡献。

4、加强党建

华西村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治理之道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有制度的全面保障。在华西，村有村规、民有民约、厂有厂纪，做到了制度全覆盖。为了重新拾起农村的优良传统，华西创新开展了党员联户“1+10”制度，由1名骨干党员联系10户左右村民，全村共有95名党员组长为970户村民家庭服务，每周入户，每月集中学习、传达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精神，并以“拉拉家常、谈谈家事”的方式，倾听村民诉求，既畅通了联系干群的“最后一米”，让干部进得了百姓门、解得了百姓忧，也增添了邻里间的“乡情乡愁”。乡风管理，既要讲法，也要讲情，村里的事情村民定，村里的发展村民办。在华西，半个小时内就可以召集全体村民开大会。村里的大事小情都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实现了党员联系群众、群众监督党员的全覆盖。现在，华西每个月都召开党委会、经济分析例会、党员联户学习会、联户组长和村民代表会、支部会议等。这些会既是中央精神的落实会，也是畅所欲言的交流会，提出的建议只要是合理的，村里能做的马上做，有难度的争取做，暂时不具备条件的等待机会做，但要对建议者解释清楚。靠党组织和党员发挥作用健全和完善乡村治理，靠发挥党支部堡垒作用完善企业治理，是华西善于运用党建法宝保证小康的关键一招。从1957年成立党组织，到1984年成立党总支，再到1989年成立村党委，华西村坚持把党建工作融入“三农”改革发展、乡村社会治理、企业生产经营的全过程，做到了工作延伸到哪里，党建活动就开展到哪里，企业的经营范围扩展到哪里，党建活动就跟进到哪里。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华西村将继续攻坚克难抓改革、集中精力抓经济、雷厉风行抓落实，始终坚定共同富裕道路不动摇，积极转变发展方式，进一步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继续走好华西特色的共同富裕之路，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新征程、新阶段中谱写百姓共同富裕的新篇章！

（来源：《中国村庄》杂志第3期）

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送：有关部委司局、全国各省农委（农业农村厅）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及各研究所
发：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各处、室、中心及下设机构

总 顾 问：刘 坚 郭书田

副 主 编：辛 梅

邮 箱：zgynjs@163.com moagov@163.com

网 址：www.zhongguanyuan.com.cn

www.moagov.cn

地 址：农业农村部北办公区 16 号楼、18 号楼

主 编：胡兆荣

编 辑：孙正恩 石 卉

邮 编：100125 100810

电 话：010—59195293 66117652

010—66067899 66167899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南 3 楼、4 楼

